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12月15日第29期 总第207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207期

## 北京高校文革专辑(十五)

### 目录

#### 【专稿】

- 舒 声 对施害者和受害者不能各打五十大板  
——以北京大学为例谈对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评价

#### 【评论】

- 王复兴 论“人民的文革”——与吴根耀学友交流  
宫香政 致艾群先生——关于北大文革史中的六个问题

#### 【述往】

- 胡志远 耿天鹏 温标 樊能廷 北大文革中“监听电话”纪实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一）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四）

#### 【书讯】

- 续霜红 聂元梓新版回忆录《我在文革漩涡中》出版  
附：出版说明·主要目录

#### 【文摘】

- 郭影秋 文革初，我在北京市委当文教书记  
——《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节选（上）

#### 【读者来信】

- 张新民谈五年来的“九一三”专辑

#### 【本刊声明】

【专稿】

## 对施害者和受害者不能各打五十大板

### ——以北京大学为例谈对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评价

舒 声

近年来的文革历史研究中，对各个群众组织的评价文章很多，大都笼统地进行否定，认为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错误的，都是派性的产物，因此应各打五十大板。笔者对这种简单的评价方式不能苟同，认为对文革的群众组织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进行具体的分析。文革中广大群众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活动，由于观点相同、利益诉求相同而自发地成立各种组织，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些组织有大有小，存在时间有长有短，所处地位不同，最终结局也不尽相同。本文以文革中北京大学的群众组织为例，谈谈个人的看法。

#### 一、北京大学文革中的群众组织

北大与其他高校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等人都是干部或教师，1966年7月底中央文革首先来到北大赶走了工作组，支持聂元梓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成为北大的权力机构，统治北大一直到1968年8月19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时间长达两年多。1966年11-12月，北大成立了一些规模较小的群众组织，如《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等，对林彪、中央文革提出怀疑，也反对聂元梓的独断专行，但很快受到校文革的打击，其成员被抓捕或批斗，组织被迫解散。1967年2月1日，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红旗兵团》、《红教工兵团》、《东风兵团》等，组成了《新北大公社筹备小组》，2月15日，《新北大公社》召开成立大会，聂元梓代表校文革表示热烈祝贺。《新北大公社》总部主要成员先后有：夏剑豸（哲学系教师，大字报作者之一）、卢平、刘冲、孙月才（研究生）、李长啸等，之后，各系各单位纷纷成

立了《新北大公社战斗团》，以系编号命名，例如数学力学系为红一团，物理系为红二团，等等。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聂元梓作为《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的代表，担任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为副组长，这就是所谓的北京高校五大红卫兵领袖。

1967年3月，北大校文革开始“整风”，由于聂元梓不接受群众意见，反而排挤打击不同意见的干部学生，北大陆续成立了一些批评和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主要有《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樊立勤）、《井冈山公社》（负责人胡纯和）、《红旗飘战斗队》（负责人牛辉林）、《北京公社》（负责人陈醒迈、赵凯元）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谢纪康、王桂琴）。其中，《北京公社》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人数较多，越有4000-5000人。7月3日，《北京公社》、《红旗飘》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发出成立《联合作战指挥部的通告》。1967年8月17日，以上五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在五四运动场召开成立大会，总部核心组成员有周培源、侯汉清、牛辉林、徐运朴、陈醒迈、谢纪康等11人。《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派代表或来信祝贺，接着《首都红代会》宣布接纳《新北大井冈山》为其成员，标志着北大校内两大对立的群众组织正式形成。

## 二、北大两大群众组织与校文革的关系及其主要分歧

《新北大公社》是在校文革支持下成立的，其负责人也是校文革委派的，实际上是附属于校文革的、被校文革控制和利用的群众组织。而《井冈山兵团》是由几个在批评和反对校文革的观点一致基础上联合成立的群众组织，所以两大群众组织的主要分歧就在对于校文革的态度上。1967年10月23日《井冈山兵团》的报纸《新北大报》发表《关于彻底改组校文革、按系、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严正声明》说：“目前校文革只能代表我校两

大派中一派的意见，实际上是一个派文革。要实现革命大联合，必须立即彻底改组校文革”。同期，还发表题为《彻底改组校文革，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评论员文章，说：“现存校文革是由聂元梓一手操纵的，拉拢亲信，排斥异己，几经清洗修补完成了的，由聂孙地下常委控制的独立王国”，“完全是和新北大公社两位一体的派文革”，它“早已把自己降为宗派小集团和纯粹的派文革”。

而新北大公社认为“承认校文革、支持校文革、加强新北大的红色政权是实现大联合的原则问题”（1968年2月15日《新北大》社论），认为“校文革就是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对它“采取什么态度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企图颠覆这个政权，就是实现反革命复辟”（2月22日《新北大》评论员文章）。

由于校文革掌握了北大的各种权力和资源，又得到了中央和北京市革委会的承认和支持（聂元梓本人就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而《井冈山》只是一部分群众的自发组织，二者处于完不平等的地位，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强者，《井冈山》是弱势群体，这是当时十分明显的态势。

### 三、校文革对《井冈山》的镇压和打击迫害

炙手可热的聂元梓在校内竟然遭到几千人组成的群众组织的反对，自然十分恼火，必欲除之而后快。她和校文革利用掌握的权力，采取了多种方式来打击、镇压《井冈山》。

#### 1. 造舆论、告黑状，抓“坏人”，安后台，抓“黑手”

聂元梓利用其地位和能经常见到中央首长的有利条件，递交了许多污蔑井冈山负责人的黑材料。1967年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委扩大会上说“（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群众是好的。”

10月5日，《新北大公社》总部发出“关于揪斗戈华的严正声明”，要求井冈山兵团“立刻把戈华交出来，斗倒，斗臭”（新北大公社多次声言，戈华是井冈山的黑高参。）

1967年12月3日,《新北大公社》红卫兵将支持《井冈山》的原北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戈华从南口抓回北大。

12月14日,《新北大》发表社论,说“井冈山兵团是孔(繁)、杨(克明)、牛(辉林)、侯(汉清)等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大方向完全错了的杂牌军,是走资派、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的庇护所”。

12月20日《新北大》发表“北大井冈山是极右势力和极左思潮的混合物”的文章,说“其要害是充当关(锋)、王(力)、林(杰)反党集团的马前卒,企图在北大复辟资本主义”。

1968年1月22日《新北大》刊登“坚决把红旗飘中的坏人统统揪出来”一文,称江青说了“红旗飘里准有坏人”。同日,还发表题为“打倒派性,揪出坏人,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社论,说“《井冈山兵团》是由反党集团把持的极右势力,必须打垮”,要求对方成员“打倒派性,揪出坏人,造反下山,加入新北大公社。”此后,以校文革常委王茂湘为首,掀起了一个“下山运动”,威胁利诱,动员《井冈山》成员下山,并在《新北大》上大肆宣传其成果。

## 2. 绑架、抓捕《井冈山》成员,私设监狱,殴打致残

校文革指使《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到处在校内外到处抓捕《井冈山》的成员,抓住后就送到私设的监狱中严刑拷打,1968年3月27日他们将反对聂元梓最坚决的生物系学生樊立勤绑架到44楼,动用酷刑,用竹签插入十指,铁钉钉入膝盖,烟头烫伤腹部,3月29日凌晨把奄奄一息的樊立勤扔出楼外,被《井冈山》人员发现,送往北医三院抢救,免于死亡,但造成终生残疾。技术物理系63级有3名《井冈山》成员被他们抓去,残酷殴打,其中郭某某被打断腿骨,女生周某某被殴打后精神恍惚。地球物理系教师彭秋和被绑架后,蒙住双眼,用铁棍殴打,和他关在同一地点的邓朴方(并非井冈山成员)也被同样殴打逼供,无法忍受,于1968年8月16日下午1点被逼坠楼。更为卑劣的是,他们假造电报,引诱《井冈山》成员到丰台火车站接人,趁机抓捕,技术物理系65级学生俎栋林

当场被抓获，遭到严刑拷打，腰部受伤，至今仍留有后遗症。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还派出大量人员到外地抓捕《井冈山》成员，哲学系五年级女生韩琴英已经怀孕，从上海被抓后其丈夫一再恳求他们手下留情，但仍遭到殴打，致使流产。他们还在外地抓捕了井冈山总部委员徐运朴、《红旗飘》成员王忠林、屈长江等，严刑拷打，逼迫他们写下“认罪书”，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

### 3. 发动武斗，围困《井冈山》，打死三人

聂元梓和校文革见他们所使用的种种手段不能达到消灭《井冈山》的目的，便策划发动了武斗，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负责人高云鹏、黄元庄、黄树田、宫香政等。1968年3月29日凌晨，《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袭击了《井冈山》人数较多的化学系宿舍31楼，身穿黄棉服、手持长矛、铁棍的武斗队将楼中睡梦中的《井冈山》成员赶了出来，被赶出者大多只穿了背心裤头，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他们还派人在校医院大门把守，不许伤者进去。

此后，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将《井冈山》在校人员围困在几个楼里，断水、断电、断粮，并发动几次武斗，打伤多人。更为严重的是，武斗期间，《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于4月19日打死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4月27日用长矛刺死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7月20日，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40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打死。

### 4. 制造“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案件

聂元梓和校文革为了彻底摧垮《井冈山兵团》，制造了一起所谓“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案件。

1968年4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下令组成“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三个专案组，研究抓这三个组织中的反动小集团，先后抓捕了颜品忠、韩琴英、徐运朴、王忠林等10多名师生，严刑审讯逼供。1968年5月9日，《新北大》刊登《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彻底砸烂北大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5月13日《新北大》发表评

论员文章，称“谁反对江青就叫他人头落地”，“牛辉林攻击江青，必须坚决镇压”。5月22日，《新北大》发表《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彻底砸烂北大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的第二号公告》，点了一批人的名，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5月底，校文革编造了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给江青，在此期间，由专案组负责人派人将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了3个多月，逼迫他们交代“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并给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邓朴方被逼坠楼，高位截瘫，终身致残。（《北京大学纪事》，787-788页）。6月27日《新北大》发表《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彻底砸烂北大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的第三号公告》，将原“红旗飘”的9个学生点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或“骨干分子”说“这是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必须坚决镇压”。7月4日，《新北大公社》总部召开“批斗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大会，将徐运朴、牛泰升、王明德等三个学生揪上台批斗。7月11日，《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言人发布《关于井冈山兵团总部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命令》（《北京大学纪事》，789页）。

实际上，所谓“井冈山反革命小集团”完全是聂元梓和校文革无中生有，认为制造出来的假案，他们借《新北大公社》总部之手发布所谓1-3号公告，并抓捕部分所谓“反革命分子”，进行批斗，反映出他们残忍、凶狠的专制行为。

#### 四、如何评价北大校文革和两派群众组织？

1968年8月19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后，接管了校文革的权力，两派群众组织也各自宣布解散。

谢静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一书中回忆道：

1969年3月24日，由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带领85人组建的8341部队的队伍



开进北大，进行了调查，并将调查的情况，不断地综合向毛主席呈送。待情况明了，毛主席说“可以表态了”之后，由8341去北大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王连龙通知在全校教职员工及其家属参加的大会上表了态，用事实狠批了聂元梓（毛主席称她为老佛爷——当时社会上的叫法）和校文革的极左行为。每天的简报不断上送，毛主席都看了。自表态后绝大部分群众是高兴的，但“老佛爷”和校文革的某些头头不服，又拿出过去的小本本来，说谁谁曾经支持他们，讲过什么话，他们是听毛主席话的，等等。

主席看了这些简报后，让工作人员打电话把我叫回去。主席让我拿笔、纸做记录。毛主席对聂元梓他们少数人的不服，非常生气，有针对性地批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领导人。

“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吗？你们就是有黑的！”

“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你们说你们是听我的话的，你们听了吗？我叫你们文斗，你们就搞武斗。我叫你们大联合，你们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主席越讲越气氛，声音也越大，怒不可遏。

.....

“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文革’，‘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

“小谢，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在北大召开的全体大会上，由你去讲。”

不几天，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全校几万师生员工的大会上，我作为其中一位发言，讲出了毛主席批评的原话。

1970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中，也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说校文革在后期实际变成了“派文革”，“武

斗文革”，“逼供信文革”。这一结论，也成为当时全校师生员工的共识，实际上是对校文革的彻底否定。

近年来，聂元梓和她的一些拥护者，如胡宗式（新北大公社办公室副主任、动态组长）、宫香政（新北大公社武斗总指挥之一）、王复兴（新北大公社66串联会负责人）等人在其回忆录和网刊文章中千方百计地对校文革进行美化，为其评功摆好，实质上是企图为聂元梓和校文革翻案，这不但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也是枉费心机的。他们在评价北大两派组织时各打五十大板，造成“错误人人有份”，不分是非，对批评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文章，则一律指责为“派性”，甚至污蔑《井冈山兵团》“是王关戚一手扶持起来的”，更是颠倒黑白，无中生有。

本文的第三部分说明，在北大文革中，校文革作为掌权者，处于强势地位，对反对它的干部师生和群众组织，一直是打压，甚至进行残酷迫害，他们是施害的一方；而《井冈山》的成员是一群无权无势的普通群众，一直处于弱势，他们是受害的一方。他们不畏权势，坚持正义，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专制行为，阻止了聂元梓对北大“一统天下”的美梦，应该得到肯定。《新北大公社》是校文革支持和控制的群众组织，其中少数人（武斗骨干和监管人员）在校文革的指使下，批斗、审讯、殴打过干部、教师和不同意见的学生，造成部分人员死亡和残疾，应当负法律责任，而绝大部分成员是没有责任的。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把北大文革出现的一些恶性事件都推到群众组织头上，否认自己和校文革的责任，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做法。原来的两派群众，都是文革的受害者。经过四十多年后，“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北大的原两派成员，应该共同进行深刻反思，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吸取历史的教训，让文革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评论】

## 论“人民的文革”

——与吴根耀学友交流

王复兴

### 本文目录

- 一、北大校友对“人民文革说”的不同意见
- 二、“一个文革”与“二个文革”争论的历史
- 三、其他理论
- 四、与吴根耀讨论两个实例
- 五、关于“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反”
- 六、关于“新北大”1967年反左
- 七、结束语

### 一、北大校友对“人民文革说”的不同意见

笔者很高兴北大校友们能注意并研究：文革史的研讨中，对“人民文革”这一理论概念的讨论。

笔者在文革回忆录《抢救记忆》一书中使用了“人民的文革”与“毛泽东的文革”或曰“两个文革”的概念对文革进行了回忆与反思。笔者希望抛砖引玉，引起人们对文革史的深入讨论和研究。校友吴根耀对此作了回应，在《记忆》190期（2017年7月31日）发表了《“人民的文革”，还是被文革愚弄和诱惑的民众——与王复兴师兄商榷》。吴说他的大作“权当作师兄弟坐在博雅塔上观（未名）湖聊天”，这使笔者倍感亲切。很愿意深入交流。吴师兄不同意笔者的“人民的文革说”，并重点讨论了1968年的武斗问题，认为派性武斗

是“毛的全国性战略部署，是名至实归的‘毛泽东的文革’。”吴不同意笔者的看法，认为1966年10月至12月的造反大潮及1975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都不属于“人民的文革”。对此，本文后面会与吴进行商榷和阐述。

上海社科院的学长孙月才兄与吴根耀持不同观点。孙月才先生在《抢救记忆》的“读后感《一幅真实而有思想的文革画面》”一文中，指出：王复兴的“回忆录”中关于“遇罗克的《出身论》及其遇害”，“《出身论》挑战特权，提倡民主、人权、人人平等，作者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判为死刑。从《出身论》的思想到作者的惨死，复兴认为确实存在着一个脱离官僚话语系统和目标的‘人民文革’。‘人民文革’的思想与‘中央文革’是对立的，这就注定了它的悲惨结局，但也注定了‘中央文革’的失败。”

孙月才又说：关于“反左反右之争”。“左右之争几乎贯穿文革全过程。从中央到基层，尤其是北京、北大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复兴对这个过程和斗争的实质作了分析，主要集中在1967年的北京和北大。他认为1967年在北京、北大两种思潮斗争中，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反极左思潮其实质是反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中的‘走资派’，它脱离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宗旨。新北大公社反极左思潮是北大文革史，也是整个文革史的一个亮点。它属于‘人民文革’范畴。”

孙月才说，“我认为复兴的论述符合史实，其论点也是对的。想补充一点的是反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思潮也包括北大“井冈山”的一部分负责人和群众，而新北大公社也并不是全体都自觉认识到反极左思潮的重要性及其实质。我由此也想到老师们反中央文革的所谓‘二月逆流’。我们当时还附和着反‘二月逆流’，那是因为对中央文革的本质还缺乏认识，但在思潮上和老师们一致的，都反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也许我们和老师们追求的具体目标有所差异，却都可汇入“人民文革”这一潮流。事实上，‘人民文革’最终在文革中是受‘中央文革’迫害的。文革以后，老师们得到公正的对待，对待红卫兵却是极其不公正的。红卫兵中违法分子理应受到惩处，但其整体不应蒙受屈辱。‘红卫兵’是一种值得认真研究的群体，要体现历史的真实。现在不管是影视中的还是舆论中的红卫兵印象都是一群

盲从的愚昧的凶神恶煞。实际情况应该远非如此。”

我与孙月才以上的观点比较一致，但也有某些差异，即对孙提到老师们的“二月逆流”也应汇入“人民的文革”这一潮流，对此笔者略有不同看法。因为“二月逆流”或曰“二月抗争”的主体不是人民群众，而是“官僚集团”。其次，“二月逆流”在中央的斗争表现为老师们反对中央文革“打倒一大片”党的干部，反抗“毛的文革”。这无疑具有正面意义。但“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的表现，却是“二月镇反”，开枪血腥镇压造反派群众。典型事例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开枪的事件。赵永夫当时得到中央军委叶剑英的支持。这应属于负面的恶性事件，属于文革中“官僚集团的政治”。其实，孙月才也说了，“也许我们和老师们追求的具体目标有所差异”，对二者的“差异”和“二月镇反”，本文后面会再阐述。

## 二、“一个文革”与“两个文革”的争论历史

在海外对文革史的研讨中，“人民的文革”说早已有人提出，并对此问题已争论了36年之久，简述如下：

1980年11月，王希哲（1974年广州轰动全国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作者之一，现流亡美国）发表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一文，首先提出了“人民的文革”与“毛泽东的文革”的观点，被学术界称为“两个文革论”。其主要观点是：对文化大革命，不能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应进行分析；文革中存在过造反派群众的反叛运动；反叛运动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反叛运动主观上是拥护、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客观上是反官僚、反体制的。这就是与“毛泽东的文革”相区别的“人民的文革”。王希哲认为“人民的文革”最典型的例子是“四五天安门事件。”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著名澳洲华人经济学家、文革中《中国向何处去》异端大字报作者，2004年7月病逝。）提出“人民文革”、“毛泽东文革”之“两个文革论”，大体与王

希哲在同一时间段。杨认为“人民的文革”最主要体现在1966年8月至12月的全国造反大潮。

刘国凯（文革时期的广州造反派，90年代移居美国纽约，2000年参与创建“中国社会民主党，并于2006年5月参加该党代表团访问瑞典社会民主党、荷兰工党、法国社会党。）他的重要著作《文化革命简折》，主张“两个文革说”，提出应从“官方”和“人民”这“两条线索”研究文革，主张三年文革的历史分期。他的《文化革命简析》最初秘密写作于1970年11月，1980年12月首发于广州油印民刊《人民之声》，1986年在美国被海外学者翻译成英文出版，1996年正式出版了中文版。

“人民文革论”者大多为居住海外的文革亲历者，他们较为漠视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论。“两个文革论”者除王希哲、杨小凯、刘国凯之外，较著名的还有胡平、王绍光、郑义。

郑义的观点较为极端。郑义（文革时在清华附中曾遭“老兵”关押、毒打；1989年5月曾参与大学生起草《绝食宣言》；现为流亡美国的作家。）在文革三十周年（1996年）、四十周年（2006年）及文革五十周年（2016年）都曾发表纪念文章，以专稿论述“人民文革”。他认为“人民文革”即是文革中所发生的人民反抗暴政的人民起义。人民的这种反抗是不自觉的，客观上是人民群众的抗暴起义。他特别强调“全红总”的事例，“全红总”曾进驻、代替全国总工会，是跨省市的全国性的工人造反组织（成员都是临时工、合同工）。后被中央打成“反动组织”取缔。郑义认为“全红总”是独立工会运动的先驱。

部分“人民文革论”者，认为文革是三年期（1966年6月至1969年九大），而不是十年。不赞同“人民的文革”论或“两个文革”论者，大多是国内学者，如中央党校的学者金春明、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徐友渔等。他们认为只有“一个文革”，即“毛泽东的文革”。

徐友渔认为，1966年10月至12月的造反运动，是“奉旨造反”，不是独立的群众性社会运动。有些“一个文革论”者，认为造反派群众只是“乌合之众”，是受领袖“愚弄”而“发疯”。类似吴根耀的观点。

乔晞华（原名张佳华，美国华人社会学博士，美国德州司法部研究人员）于2015年出版了著作《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书名即他的基本观点。这是独树一帜的第三派观点。乔晞华认为“一个文革说”（“毛泽东的文革”）的缺陷是：“毛泽东的文革”并非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它只是毛泽东开展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其次，乔认为：既然文革中根本没有“一个文革说”学者所指的那种“革命”（无论是“人民文革”还是“毛文革”），为什么他们对属于“改革运动”的文革造反运动与党的运动的迥然性质视而不见呢？学说和理论的提出总是基于一定的假设，无论假设是明确的或是暗含的。持“一个文革说”的学者认为群众造反运动不能独立作为社会运动的暗含假设是：亿万民众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乌合之众”，是一群没有思想只会盲目跟从毛忽悠的群氓。认为“民众参与文革是盲从、不明真相。”<sup>1</sup>校友吴根耀也正是这种观点，正是如此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民众的。乔在书中列举了大量事实，分析并证明文革中的每一位民众所选择的政治立场，所参与的社会运动，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所作出的理性选择。

乔晞华举例并分析如下：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还记得全国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放到现在来看，这些疯狂而又愚昧的举动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不禁会问，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到哪儿去了？但是，假如您身处实境就不会感到奇怪。如果周围的人都在跳忠字舞，都在早请示晚汇报，您敢一个人逆潮流而行，不参加这些活动？人们参与这些荒唐的活动不是愚昧，而是出于自保，是理性的行为。

1968至1970年间，我所在的班级的男生调皮捣蛋、不守纪律、不服从工宣队的管教，在学校里出了名。（文革时乔是南京外语学校的学生——本文作者）这是一批“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捣蛋鬼”，令老师和工宣队师傅头疼不已。但是当我们在工厂学工期间全社会掀起跳忠字舞的浪潮时，全班的男生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捣蛋，都乖乖地跟着众人跳起来。因为大家心里明白，谁胆敢在跳忠字舞时捣蛋，后果不堪设想。

<sup>1</sup> 乔晞华：《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台湾，博客思出版社，2015年，第164、167页）

文革期间发生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中，有一位年轻的女预备党员因为胆子小不敢杀人，用马刀在死人身上舔了点血回来验刀。结果被人揭发差点没保住党籍，硬是把转正期延长了一年。当一个大队的两个民兵带回区里的指示时，再没有人敢唱反调了。谁都明白，再唱反调，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扣过来可不是好耍的。杀还是不杀已经不成为问题，讨论的焦点是怎么杀。道县的杀人者中不乏为自保而不得不杀人者，因为谁反对谁就会大难临头，刘香喜因为反对胡乱杀人被抓入牢房关了四年。许多人的表现是以攻为守，为了自己不被打，主动地攻击别人。

如果说以上的例子都是民众被动地为了自保体现出理性的一面的话，那么文革中“全红总”的举动就绝非是被动自保的问题了。1966年11月8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诞生了。<sup>1</sup>该组织活跃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组织起大批在工矿企业中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的临时工与合同工，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中央文革试图利用使之成为打手，但是该组织并不热衷于斗“走资派”，而是积极争取与工人有切身关系的经济利益。官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大事辑要》）对“全红总”作了这样的评价：由于江青在一九六六年底讲话煽动临时工、合同工造反，并提出一些不合理的经济要求，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大批工人外出，闹转正，闹复工，闹工资福利待遇，闹增发劳动保护用品和保健食品等，从而刮起一股经济主义歪风，严重地冲击了国家财政经济。由此可见该组织当时的影响力和规模。

乔晞华指出：

即使是持“一个文革说”的学者们也不得不承认文革中民众诉求自身利益的现象。金春明认为“两个文革说”把文革按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研究，将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领导和群众，工人和农民，造反派和保守派，红五类和黑五类等等加以区别，他们参加文革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表现，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利益等。这些观点无疑有其合理性。

---

<sup>1</sup> 跨省、市的“全红总”是全国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仅北京分部就有5万工人。其成员都是“临时工”、“合同工”，他们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起而造反，一度进驻并代替了“全国总工会”。但很快被中央宣布为“反动组织”，被取缔、镇压，其工人领袖被逮捕、关押。



坚持民众是非理性的社会运动理论淡出研究领域至今已经有 40 多年了。该派理论是否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重返舞台东山再起，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但是在过去的 40 多年间新出现的社会运动理论中，再也没有谁敢把民众假设成是一群智力低下、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利益诉求、任人欺骗的傻瓜是不争的事实。<sup>1</sup>

我很赞同乔晞华以上的举例分析与论证，不知是否能说服吴根耀？

特别是“全红总”的例子，鲜明地体现了文革中工人（合同工、临时工）造反是出于自身受歧视的经济地位，是理性的选择。而绝不是被领袖忽悠的盲从。吴根耀认为文革中的民众只是被愚弄和诱惑的民众是不符合实际的。

乔晞华认为“两个文革说”（即“人民的文革”与“毛泽东的文革”）也有缺陷。乔在上述他的著作第 190 页指出：

“人民文革”的全称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该名称造成了歧义。正如“毛文革”或“党文革”一样，文革中发生的运动与革命无关，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定位“革命”使自己陷入无法自证的境地。更遗憾的是郑义把“人民文革”视为一次“人民的起义”。这种作法无异于授人以柄，为“一个文革说”者留下了口实。当“一个文革说”批驳“人民文革”是“奉旨造反”时，“两个文革说”的反驳竟是：“奉旨造反”也是造反，显得有气无力。如果持“两个文革说”的学者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文革中民众的造反行为是社会运动理论中常见的“改革运动”，那么他们就理直气壮得多，遇到的阻力会比现在要小得多。郑义的“起义说”过于激进，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使人难以接受，成为“一个文革说”学派的众矢之的。真理向前一步是谬误。不幸的是，郑义在“人民文革”已经错跨了一步的情况下，又跨了一步。

我很赞同乔以上的论述，因此我所主张的“人民的文革”说，有别于郑义的“人民的文革”说。笔者认为“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都是社会改革运动，而不是推翻

---

<sup>1</sup> 以上 6 段引自乔晞华《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第 176-181 页。

歪整个体制的“革命”。笔者在《抢救记忆》（2016年10月《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第126、127页明确指出：

关于“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的概念，笔者要着重指出的是：无论是毛泽东或是人民大众，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之“革命”并非经典意义的“革命”，并不是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推翻全部国家政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毛泽东在1月风暴后就曾批评“彻底改善国家机器”的观点是反动观点，因真要“彻底改善”，他自己也要被“改善”、被“革命”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是个悖论。“无产阶级专政”与“继续革命”本身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要“继续革命”就势必要革掉“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便势必要对人民群众的革命造反进行镇压。毛泽东理论上的混乱、荒谬，造成全国大乱，并走向失败。“人民的文革”，虽然脱离了毛泽东的旨意、部署、纲领，但文革中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推翻国家政权，改变整个体制的大规模人民运动。既使在1966年10月至12月的全国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中，“人民的文革”也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而是要捍卫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此前提之下反抗迫言。“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追求的目标都是社会改革，追求的是体制内的部分改革，说到底社会改良运动，而不是推翻现存整个体制的“革命”。但毛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在改良方向上是对立的，“人民的文革”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平等、法制、人权、安宁，这不符合毛的文革要大乱、大治、革命、专政的宗旨，这便决定了人民文革失败的命运。

笔者认为在文革中，不同的阶层、集团、人群有着不同的利益述求，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运动。毛泽东的文革占着统治地位，是文革的主线。但造反派群众有自己的利益述求。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骨干大多是在“50多天”的工作组时期，在“反干扰，抓游鱼”时被打成“右派”、“反动学生”的人。他们不甘心受迫害，要讨个“公道”，要自由，因而带头造反。这是他们在1966年8月至12月反工作组，进而炮轰省、市、中央各级党委的内在动力。1966年第4季度民众的造反运动与“毛泽东的文革”客观上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毛泽东要利用造反派打垮自己的政敌刘、邓。造反派则利用毛泽东号召“炮打司令部”，“趁机”造反。民众的造反是不自觉的潜意识行为，主观认识上是“奉旨造反”，奉皇帝之命反贪官，使自己具有了合法性、安全性。

笔者对“人民的文革”定义是：文革中，以群众造反派为主体的，以反迫害、要自由为利益述求的，以民主、人权、法制为最终目标的，脱离了“毛泽东文革”宗旨、部署的相对独立的社会改革运动。

“人民的文革”产生之根源在于从17年到文革10年始终存在的“官民矛盾”。矛盾的爆发需要“机会”，毛泽东发动文革，发布《五一六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下令广播聂元梓等七人“5.25大字报”等就是民众造反的“机会”。从而形成了“人民的文革”运动。“官民矛盾”是“人民的文革”发生、发展的根源与动力。

笔者对“毛泽东的文革”定义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亲自发动、领导、指挥、部署的文革运动。毛泽东通过发动群众，打倒政敌，巩固其独裁权力，企图构建以“五七指示”为蓝图的“新社会”。其性质为社会改革运动。

笔者所理解的“人民文革说”，并非从概念出发，而是笔者在反思文革的过程中，琢磨“文革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形成的看法，形成的基本观点，反过来又成为笔者分析文革的一种方法论。学界持“两个文革说”者并没有统一的观点，不同的人有不同说法。王希哲与郑义两位先生对“人民的文革”说便有差别，我与郑义先生的差别就更大。

吴根耀批评笔者的“人民文革说”，质疑笔者：“人民想发动文革吗？”其意是笔者认为人民想发动文革。其实笔者在《抢救记忆》一书中，从未讲过“人民想发动文革。”吴大概是从“人民的文革”字面上的表面含意来批评笔者。但“人民的文革”说并无统一的理论，也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其含意。而要看不同作者的具体观点。

关于文革是怎样爆发的？笔者在《抢救记忆》一书中，详细回顾了对文革爆发起了重大作用的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过程，并运用“两个文革说”

对此进行了论述。笔者在第49页至50页写道：

我于2015年4月17日拜访聂元梓，向她求证：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面世的？她再三肯定“是自发的。”5月19日北大党委开会传达了《五一六通知》，聂元梓在5月19日听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后，觉得北大的问题有希望得到澄清了，在社教中提意见而后在国际饭店会议挨整的人有希望平反了。于是打算给中央写信，写报告。后来与其他五人（赵正义、宋一秀、杨克明、高云鹏、夏剑彘）商议，决定不写报告，改成写大字报。听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是聂元梓等人下决心“造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炎黄春秋》于2010年第一期刊载了聂元梓给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与康生老婆并无关联。没有曹轶欧或者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也同样会被毛主席批示广播的。”聂的这个说法符合实际。

以我之见，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与两件事关联最大。一是“国际饭店会议”，反映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二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旨意。没有“国际饭店会议”或者没有“五一六通知”，缺少一样，都不会有北大的第一张“5.25”大字报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这是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回顾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世过程，说明文革的爆发是上层政治斗争与社会矛盾互动的结果。而不是阴谋论的产物。

笔者在拙作第69、70页，同样运用“两个文革”的方法论，论述了清华造反派的诞生过程。笔者写道：

清华的蒯大富6月21日贴出反工作组的小字报。王光美指蒯“要夺权”，薄一波指示“要反击”。工作组组织师生在校园游行，高呼“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全校展开了“反蒯”斗争，各系整了不少学生。我们班徐森和清华汲鹏是北京13中同班校友，我们去清华看汲鹏，听他说工作组整了很多，各系都抓了一些反工作组的反动学生，他和蒯大富一样，被打成反党分子、反动学生。王光美的清华工作组比北大工作组整人厉害得多。北大

揪出 40 多个“反动学生”，清华揪出了 800 多个“反动学生”。因此清华在后来批资反路线时反弹的力度比北大就大得多。8 月初周恩来到清华为蒯大富平了反。平反后的蒯派后来组成清华“井冈山造反团”，矛头自然地直接指向了王光美、刘少奇。毛刘之争在清华表现的更明显。毛泽东一反 1957 年之道而行之，利用了反迫害，要自由的群众，冲击刘邓控制的党务系统，以夺回他自己所说的已“大权旁落”之大权。毛泽东曾把自己的斗争谋略总结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他对这一权术的运用，在文革中屡见不鲜，十分纯熟。

清华运动翻转，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央的斗争与底层社会的矛盾斗争之间，相互交织与互动。

1957 年反右后，人们普遍不敢给党的领导提意见，谁给基层领导提了尖锐一点的意见谁就是反党、右派。这成为绝大多数党团干部的定式思维，成为文革初期保皇大军形成的思想根源。但在 1966 年 8 月事情发生了变化，8 月《红旗》11 期刊文，透露《人民日报》6 月 1 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时，毛泽东加了一条注：“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而后《人民日报》也发文宣传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这对当时我和我的同学好友们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造反有理”的根据。“对错误的领导应坚决抵制”这一党中央的新的提法，对 1966 年 8 月以后造反派抛弃 57 年反右思维，形成造反大潮，影响巨大。

### 三、其他理论

乔晞华既不同意“一个文革说”，也不同意“两个文革说”，那么他主张的文革理论是什么呢？他用西方社会学的博弈理论解释文革。乔把文革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划分为六个集团：党内激进派；党内温和派；党内保守派；民众的激进派（造反派群众）；民众的温和派（温和的造反派群众）；民众的保守派（俗称保皇派）。党内有 3 派，民众有 3 派，共有 6

支政治力量、6个集团。6个集团在文革中登台博弈、表演。

文革中党内三派，各指何人？乔在书中并没有对号入座，没有指名道姓地进行论述。按笔者个人理解：激进派应指毛、林、中央文革；温和派应指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人；保守派应指刘、邓及部分省、市委、中央部委党的负责人。周恩来是哪一派？笔者认为周较为复杂，应该明是“激进”、暗是“温和”，或摇摆、周旋于“激进”与“温和”之间。怎样对号入座，具体分析党内各派的代表人物？就此问题笔者曾向友人乔晞华讨教，乔答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具体说明。

乔在其上文提到的著作中（214页）指出他“对文革的定义”如下——

始于1966年终于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此期间，党内的激进派、温和派、保守派、民众的激进派、温和派、保守派六个集团进行了一场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式的博弈。文革以群众造反兴起，激进派与保守派斗争，党内保守派的失势开始，继以民众激进派失利受整，最后以激进派的失败而告终。

钱理群先生、杨继绳先生对文革史的论述与乔晞华不同，但有某些相似之处，几位学者都是从多角度深入分析文革中各种集团的互动与斗争。钱理群曾在《记忆》170期上著文《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运动》，用“群众政治”、“独裁政治”、“官僚政治”这三个概念，从三个角度、三条线索，深入分析了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

对钱教授上述大作，清华的文革亲历者们进行了热烈讨论，孙怒涛在《记忆》174期谈了他的“读后感”。孙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斗争。怎么论述这场政治斗争？方家众说纷纭。钱文提出了这是一场由独裁、官僚、群众三方缠斗的政治斗争。文革的主脉络是：在初期，独裁政治联合群众政治向官僚政治发起猛烈冲击，取得了夺营拔寨斩主帅的伟大战

果。但因群众政治的内讧和官僚政治的反扑，独裁政治无奈抛弃了群众政治。之后，独裁政治也因其内讧和官僚政治的多次顽强抵抗，在主帅归天之后迅速覆灭。文革以官僚政治的最终胜利而告结束。在这过程中，各种政治有进攻有退却有反攻，有联合有抛弃，有投靠有离心，有内讧有分化，有安抚有镇压。这场气势磅礴、扑朔迷离的十年内斗，堪称是一场现代版的三国杀！以三种政治形态的大格局来评判文革并给文革进程一个比较合理的接近历史真实的诠释，这是钱文的重大意义所在。

杨继绳则在他的大作《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中，从毛泽东、官僚集团、造反派群众这三个方面深入叙述并分析了文革史。特别是官僚集团在文革前、文革中各个阶段、文革后，各个时期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和分析，令笔者印象深刻。

杨继绳在其大作“导论”第33页指出：

“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能停止转动的官僚压得粉碎。”

杨在36页指出：“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化大革命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笔者认为杨先生的评论与分析非常深刻、到位。

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文革亲历者从多重角度回忆、分析、论述文革史，因为文革本身是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运动，它是多个侧面的组合，是多个层次、多条线索相互交错，多种政治力量、集团不断地分化、组合，相互缠斗的过程。用简单的“肯定”、“否定”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不可能全面、客观地记录与评论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复杂的事

物必须复杂地分析，才能避免“以偏概全”、“以单掩全”。

钱理群的“三个政治”理论概念，杨继绳从三个集团、三条线索论述文革，与乔晞华的六个集团博弈论、笔者所述的“两个文革论”，虽然具体内含不同，但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从多角度、多主体、多线索来分析文革历史，而不是毛泽东的单一文革线索。

36年来，对“一个文革”还是“两个文革”的争论，至今没有争出个结果，说明两种论说各有各的道理。但争论的效果却十分有益，大大地促进了学术界对文革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人民的文革”说，我和吴根耀校友尽可求同存异，继续探讨。

#### 四、与吴根耀讨论两个实例

吴根耀不同意笔者对“人民的文革”所列举的三个实例。对1966年10月至12月的造反派群众在全国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笔者在上文已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对“四五天安门事件”，无论如何都很难说它是“毛泽东的文革”，不正是毛泽东把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吗？“四五事件”是各阶层人都卷入了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从1975年3月3日至4月5日，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有上千万人卷入了这场公民权力运动。人们借悼念周恩来为名，发泄对文革的不满，矛头直指“四人帮”，指向毛泽东，要求结束文革“浩劫”。人们喊出了“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的口号，成为与“毛泽东的文革”相对立的群众运动。这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你不能说它什么也不是。在文革后期发生这件特大历史事件，是典型意义的“人民文革”。它与“毛泽东文革”相对立，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它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来临，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充分的舆论准备。在“四五事件”中，“人民的文革”与“毛泽东的文革”同时存在，针锋相对。

笔者提出“人民的文革”说，与其他持此论者不同，其他“人民文革论”者都仅从正面论述“人民的文革”的意义，但我认为“人民的文革”也有负面教训。造反派民众做为



社会运动的一个主体，在进行群众运动的过程中，并非永远正确，并非总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林彪在文革中曾说“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这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民粹主义。人民群众也会犯错，笔者认为从1967年中到1968年8月遍及全国的激烈的派性斗争及大规模武斗，就是属于群众运动中，大方向完全错误的潮流。

吴根耀在文中一方面说自己“重点讨论武斗问题，指出它恰恰是毛的全国性战略部署，名至实归的‘毛泽东的文革’。另一方面在文中又说，“68年的武斗确实不是毛期望的，因为他已经想‘文革收尾’。”吴前后矛盾，到底68年的武斗是不是毛的战略部署呢？我认为吴的后一句话正确，毛并不想见到68年的全国大武斗。毛发动文革，要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江青于1967年7月提出“文攻武卫”，对武斗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1967年9月以后，毛明显地调整了战略部署，要“收摊了”。毛泽东于1967年7、8、9月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发表了一系列“最新指示”，提出要：制止武斗；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进行斗、批、改。明确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

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编辑部社论”，号召学习、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社论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记得当时笔者就曾与“公社66派”同学反复讨论过，觉得毛主席的指示非常符合北大的实际。北大两派师生，那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本来都同在北大生活、学习，又共同响应中央号召投入运动，现在仅仅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就相互把对方视为“敌对阶级”。本应相互尊重，却相互仇视；本应平等相处，却要压倒对方；本应相互合作，却要残酷斗争。这本来是很明白的道理，但两派群众的大脑都被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观念搞乱了。早在1967年6月11日，“公社”化学系战斗队“起风雷”贴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大字报中，该大字报就曾批评本派领导孙蓬一“用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来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表现出“‘左’的可爱”，进而“打击不同意

见。”其实“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打击不同意见”，两派同样存在，但人家的缺点错误应由人家自己讲。

10月7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指出，要实现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要告诉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是他们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已经不听毛主席的话了，“毛的文革”已失控。北大、清华的大规模武斗都发生在毛发表一系列最新指示之后的1968年2月以后。据此吴怎能说68年武斗是毛的旨意、部署，“是名至实归的‘毛泽东的文革’。”呢？虽然北大、清华的武斗从师生们的思想根源来追究，是由于受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斗争不可调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革命”、“不断革命”等理论、观念的影响，但从具体实践和选择上，两派群众及其领导有自己的历史责任，该担当的应担当，各有各的帐，不能往上推。应该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拿北大的武斗来说，笔者所支持的校文革以及本派的“公社”武斗队，曾打死对立派及无关群众三个人，曾非法私设刑堂，关押、殴打对立派群众，搞逼供信，樊立勤同学的小腿骨竟被打断。这是严重的错误与罪行。对此，武斗队伤害他人者有着直接责任，校文革、聂、孙有着间接的领导者责任。“井冈山”的武斗人员也曾打伤许多“公社”派的同学，曾绑架干部崔雄崑，打伤高检院干部谢甲林，刺伤聂元梓。两派当时都视对方为“敌对势力”，在毛泽东的共同旗帜下，竞争谁比谁更革命，展开了激烈的内斗，甚至以冷兵器厮杀。两派武斗队都忘了，本是师兄弟，相煎何太急！总之两派武斗，都错了，没有正义一方。个别北大校友至今热衷回忆北大武斗，把自己打扮成反抗侵略的正义战士，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又让人感叹：文革对人性之毒害太深了！

当年“井冈山”的武斗队有700人左右，“公社”武斗队有900人左右。据“井冈山”武斗人员说，在武斗后期他们仅剩200人左右。在后期“公社”武斗队也人员大减。两派

逍遥派师生有 10000 人左右，占全校师生总数 86% 以上的人厌恶武斗，躲避武斗，许多人都回家了，他们相对那些两派热衷武斗的少数人，大方向正确的多。武斗已丧尽人心。但大多数人却对武斗局面无可奈何。校园的形势被两派激进的头头所控制。

百日武斗时的清华，处于广阔中间位置的两派逍遥派群众，曾企图制止武斗，促进两派头头联合，做了种种努力，但是失败。

文革中，运动曾多次失控。毛泽东并不是神，他并不能始终完全掌控群众运动，反而常常穷于应付。这说明文革的全过程并非始终是“毛泽东的文革”。毛泽东在文革中不能始终控制运动的走向，这是许多文革史学者的见解。印红标认为即使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毛也很难用诱导、教育、命令的方式完全改变某一类红卫兵的基本方向。王绍光认为，毛虽然动员群众发动了文革，但是他很快转入“救火队”的角色。班国瑞认为，毛采用群众运动的策略比较冒险，总是以群众运动失控而告终。根据解密的 1968 年 11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文革的评估，美国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人员认为，毛并没有在所有的时间完全控制局势，并不是按照他事先计划好的方案进行他的步骤。美国中情局的评估是很到位的。

1968 年北大、清华的长时间武斗，使毛泽东对运动失控，这使他非常恼火。为此，毛在 1968 年 7 月 28 日召见了红卫兵五大造反派领袖，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把造反派赶下了历史午台。毛在此次召见时对聂元梓、蒯大富等五人讲：“蒯大富要抓黑手，”“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结果去了三万人。”“你们搞了二年，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干涉，用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毛泽东挑明了，要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干涉大专院校的运动了。

随后，工军宣队开进了清华、北大，开进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毛泽东用工军宣队的力量，重新控制了文革运动。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开始恢复、重建被他打乱的党国体制。

## 五、关于“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反”

笔者认为“二月逆流”或称“二月抗争”不宜作为“人民的文革”来理解。几位老师、副总理当年都是文革初期在朝的官僚集团。他们于1967年2月大闹怀仁堂，与“中央文革”进行斗争，表达了对毛泽东发动“批资反路线”后，全国造反派炮轰各级党委，出现了“打倒一大片”党政干部局面的强烈不满。对上，他们反对毛的文革路线；对下，他们仇视造反派群众的造反运动。因此，在上层“二月抗争”具有抵制“毛泽东的文革”“打倒一切”的正面意义；在下层，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的支左部队开枪镇压，大肆抓捕、关押造反派群众，称为“二月镇反”。对此不能做正面评价。中央的“二月抗争”与地方上的“二月镇反”是同一个潮流，是党、政、军官僚集团是对文革初期造反运动的逆向反应。

在对文革的许多回忆文章中，“造反派”一词曾被滥用，其实“造反派”一词在文革中就是特指从1966年7、8月开始全国各地反刘、邓工作组，继而在10月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轰各级党委，到了1967年1月之后参加1月夺权风暴的群众。文革初期的“老兵”，搞“血统论”，后来制造“八月红色恐怖”，后来转变为“保爹保妈派”，他们不是造反派。1968年进驻全国高校的工军宣队，搞清队，迫害知识分子，这些人更与“造反派”风马牛不相及。研究文革史的学术界及众多文革历者，近年已有许多人提出对“造反派”的概念不应滥用、乱用，而应严格界定，以便能真实地还原历史。

所谓“二月镇反”，是从1967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至4月，在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发〔67〕117号）文件后才有所抑制。青海省的“2·23”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下令开枪的流血事件，是“二月镇反”的突出事件。

2月23日之前，青海造反派“8·18”响应中央号召向上海“造反派”看齐，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其实只是夺了几枚公章，并无任何实权。“造反派”真正能控制的是《青海日报》社，能为“造反派”大造舆论。报社成了“造反派”的中心。2月14日，赵永夫

以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发布公告，称《青海日报》被一小撮别有用心人操纵，对青海的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破坏作用。决定自即日起对报社实行军管。结果遭到报社职工坚决抵制，有20多所学校学生涌进报社，保卫报社。有2000多造反派在报社院内搭建帐篷进驻。21日，赵永夫主持会议，确定23日取缔“8·18”，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23日上午8时开始，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部队共计十三个连，团团包围了报社。赵永夫在临近的宾馆指挥。11时10分，军队枪击“8·18”广播站。下午2时，枪声大作，十几分钟，几百人倒在了血泊中。群众伤亡347人，其中169人亡，178人伤。23日晚8时许，中央军委一位领导给赵永夫电话，说“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赵永夫“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打此电话的军委领导人是叶剑英。《叶剑英年谱》1967年2月23日条目证实了此事。

“2·23事件”之后，省军区对“8·18”实行了“大捕、大打、大斗、大抄家”。被逮捕、拘留、看管、软禁的达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2月24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学生，打死打伤12人。

3月24日晚至25日凌晨2时半，周恩来在人大大会堂安徽厅主持处理“2·23事件”，宣布中央决定。当场军人揪下赵永夫领章、帽徽，并押走了他。3月29日，周恩来在人大大会堂安徽厅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指出“青海省军区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对西宁‘8·18’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300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文革结束后，根据叶剑英指示，赵永夫获释，任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

从1967年的2月至4月的“二月镇反”中，内蒙、四川、湖北、福州、贵州、湖南、河南、南京、广州都曾发生军队向造反派群众开枪、或取缔造反派组织，或逮捕、关押大批群众的恶性事件。<sup>1</sup>

<sup>1</sup> 以上7段摘要引自杨继绳《天地翻覆》上篇397至408页。

综上所述，“二月镇反”是军政“官僚集团”血腥镇压群众的恶性事件，而“二月镇反”与“二月逆流”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它反映了文革期间，“官僚集团的政治”。由于1966年8月至12月的反工作组、批资反路线、炮轰省、市、中央各级党委的造反运动，是毛泽东与造反派的联盟，因此到了1967年2月时，军政官僚集团对造反运动进行抗拒时，势必上抗下压，对上反抗毛泽东，对下残酷镇压造反派民众。据此，“二月逆流”不能称为“人民的文革”。“二月镇反”是对“人民的文革”的反动。

## 六、关于“新北大”1967年反左

我与北大学长孙月才以下意见一致：1967年北大文革中曾出现群体性的反左的倾向与潮流。校文革、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骨干群众，包括一部分“井冈山”师生，曾经以反左为主，而不是反右，他们的主要斗争矛头是对准了极左派吴传启、林杰、王关戚，而不是老干部中的“走资派”。它脱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轨道，应属于“人民的文革”范畴。

当时“新北大”的这种反左倾向，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是，江青于1968年3月曾多次公开或私下批评聂元梓：“我要你反右，你偏要反左！”（详见《抢救记忆》186页至188页）

1967年4月12日，孙蓬一在北大大饭厅的演讲，就是一篇反极左，反吴传启，反王关戚的宣言书。孙在演讲中点了吴传启的名，并进一步指出：有人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句话就是不点名地批判了关锋、王力。指出他们“为了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们就不惜破坏革命大联合。”“采取拉一伙，打一伙，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是拉大旗作虎皮。”批判了他们从左的方面分裂群众，到处伸手抢权。孙蓬一的“4.12演讲”，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代表着“新北大”，以大无畏的精神向极左派宣战！在北大、北京高校、北京市，产生了巨大影响。

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骨干群众以及部分“井冈山”的师生，当年曾反左，反王关戚，这是客观发生过的事实。这是北大文革史的一个亮点，值得挖掘与总结。

尽管1967年聂、孙、校文革、“公社”群众不能不跟随大潮流，炮轰刘、邓，批判“走资派”，例如校刊《新北大》就曾刊登过许多批判刘少奇、批判“走资派”的文章。不这样做就会“犯错误”，甚至跌大跟头，倒霉遭殃。但他们头脑中的兴奋点及行动中的着力点，却是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反极左。为着自保，只能在策略上明反吴传启，暗反王关戚。这既是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

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文革期间在全国各地，人民群众中的反左情绪、反左倾向始终存在着，并且日益发展，到了1975年，终于汇成反左巨流，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了中国现代史罕见的大规模公民权力运动。“四五天安门事件”不是凭空爆发的，它经历了一个多年的酝酿过程，1967年“新北大”的反左倾向便是一个重要例证。反左反右之争贯穿文革始终，反左倾向在民众中的发展，是研究文革史中“人民的文革”发生、发展的重要线索。

当年“新北大”的反左，并没有上升到自觉地反中央文革路线，反而主观上认为是在捍卫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是在为中央文革“除隐患”，是在保卫、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历史的局限性。

## 结束语

笔者此文着重讨论了“两个文革说”，即“人民的文革”与“毛泽东的文革”。介绍了文革史界有关“一个文革”与“两个文革”争论的历史。说明了笔者对“人民文革说”含意之界定。与吴根耀学友交流了意见。希望能抛砖引玉，促进对文革史的深入探讨。■

【评论】

## 致艾群先生

### ——关于北大文革史中的六个问题

宫香政

我在《记忆》第182期上发表了《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兼与俞小平、陈子明、林爻、艾群先生商榷》一文后，《记忆》第190期刊登了艾群的《答宫香政同学的质疑》一文。艾群先生在该文中写道：“文章面世后，多家报刊转载、转摘和引用，另有多种图书收录。尔来30余年，从没听到有人质疑。”“还轮得到你宫香政30年后无端置喙？”

我对艾群先生的文章提出质疑，目的是为了搞清史实真相。但他却在文章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讲什么“申请”、“批准”、“流程上的缜密合规，确保了内容的客观真实”，等等。绕了半天弯子也没有回答我所提的问题。

近来，我又拜读了艾群先生在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之际所写的《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以下简称“艾文”）；还拜读了艾群先生在90年代与别人合写的《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今昔：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兵、韩爱金、蒯大富》，其中“乱世狂女聂元梓”一文就是艾群先生的作品，文中写道：“不久前，聂元梓结束了她73岁的一生”。然而，现在聂元梓却以九十六岁高龄活在人间，不知艾群先生对此作何解释？

“艾文”中有许多地方与历史事实不符，笔者不得不予以指出。

#### 一、康生是否是第一张大字报的幕后主使？

“艾文”发表在2016年出版的《燕园风云录》（四）上，文中写道：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的文章《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披露，康生派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该文指出，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是曹轶欧授意张恩慈串联聂元梓等人写出的。



由此可见，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属于康生、曹轶欧整个谋划的一部分。

艾群先生采取“借用法”，借第三方之口来断定“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属于康生、曹轶欧整个谋划的一部分”，缺乏证据，是苍白无力的。最具权威性和说服力的应该是大字报作者自己。现在七名作者中已有二人作古。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大字报是“五·一六通知”的产物，她从组织原则出发，事前请示了曹轶欧能不能贴大字报；但大字报的具体内容，怎么写，怎么措辞，同康生、曹轶欧没有什么关系。夏剑彘、高云鹏两位作者均已明确表态：“大字报本身与康生无关，是自发行为。”校友王复兴经过多方调查采访，在他的《抢救记忆》一书中已有翔实的叙述。

“艾文”是作者重读《聂元梓回忆录》之后写的，为什么完全忽略了聂元梓的说法，作者是选择性阅读的吧？

大字报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是否为康生所指使，而在于这是毛泽东批示向全国广播的，是《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配发了评论的，大字报在当时获得极高声誉，完全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报所赐。某些人喋喋不休地强调它和康生的关系，是为了给毛泽东减轻责任，还是给党史添堵？！

## 二、上海串联真相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她受毛主席指派带队去上海串联之事。智晴先生的《文革初期聂元梓赴沪串联大有来头》<sup>1</sup>一文认为：“文革初期聂元梓赴沪串联，确实大有来头：奉毛泽东之旨行事”。舒声先生也是接受这一说法的，他在《从支持、利用到否定、抛弃——从毛泽东对聂元梓态度的变化看造反派领袖的结局》一文中写道：毛泽东亲自派李讷来北大，指示聂元梓去上海串联，表明他当时对聂元梓是多么信任，多么倚重，也是利用北京的造反派去冲击运动相对落后的上海的一步棋。聂元梓接受了毛泽东的任务，带领亲

<sup>1</sup>该文载《记忆》2016年11月15日第174期。

密助手孙蓬一等人，11月19日到达上海，直到12月16日回到北京。<sup>1</sup>

然而，艾群先生却在文中写道：“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江青确实给了聂元梓指示，指示聂元梓带队去上海造反”。

“毛泽东派聂元梓去上海串联”，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王力反思录》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述：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众组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造反派连在一起，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和上海连成一片。……我跟聂元梓说时再三叮嘱这几条，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决定。<sup>2</sup>

艾群先生在文章中采用“模糊法”忽悠读者，搬出所谓“讯问笔录”说事。我不仅要问艾群先生，在“讯问笔录”中，江青是怎样指示聂元梓的？聂元梓的原话是怎样说的？有她的签字吗？

在对聂元梓起诉时，出于政治考虑，检察机关有意把毛泽东与江青区别开来，硬说是江青派聂元梓去上海串联。我认为：无论是毛主席派聂元梓去上海，还是江青派聂元梓去上海，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艾群先生是媒体人，当然要“紧跟政治形势”，按照上面的口径说话，但在文革发动五十年后的今天，你还在聂元梓去上海串联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一定要说是江青派去的，实在令人费解。

### 三、“除隐患战斗队”是“揪叛徒”的吗？

所谓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中的一大事件，此案所涉及的人都是党的高级干部。这是个历史问题，本和北大没有什么关系。

“艾文”采取“模糊法”和“时间倒置法”，并编造谎言试图把聂元梓打成制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的始作俑者，真是可笑。

<sup>1</sup>该文载《昨天》2017年8月30日第96期。

<sup>2</sup>王力：《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版，第505页。

“艾文”写道：

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1967年4月14日，在一次大型集会上，聂元梓找到康生说：“我们组织了一个‘第二战斗队’也就是‘除隐患战斗队’，专搞揪叛徒的斗争。”聂元梓汇报说，前一段揪叛徒的调查工作遇到困难，进展迟缓，请康老给予指示。康生掏出笔来，当场写下一张字条：“新北大的一个革命组织要揪叛徒，望有关方面给看必要的材料。康生”，返校后聂元梓把康生的手谕复印出来，挑选精兵强将组成揪叛徒兵团，把“揪叛徒”的组织工作和活动方案写成报告，呈交康生。

“艾文”还写道：

经过一段调查，在聂元的授意下，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为叛徒，从而加剧了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迫害。

没有经历过文革、不了解内情的读者或许会被艾群先生这种谎言所迷惑。但一个人的谎言是无法掩盖历史真相的。事实真相是：

(1)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在批示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刘少奇、张闻天作出了“叛变的决定”。“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从这份中央文件开始，文化大革命才产生了全国范围内“揪叛徒”的高潮。原先只是抓“走资派”，现在加上了“揪叛徒”。而这个“揪叛徒”的中央文件下发之时，北大在抓叛徒事情上还没有任何动作。众所周知，在“揪叛徒”方面走在前面的是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

(2) 关于“揪叛徒”，周总理对北大有批示。1967年3月下旬，二机部有一个人来校找聂元梓，当时聂不在，孙蓬一接待了他。来人提出：他们发现了三十年代北京的一起叛

徒案，希望北大协助他们搞清。4月3日晚中央首长接见中学红卫兵代表，孙蓬一参加了这次接见，并坐在第一排，恰好坐在总理的对面。孙蓬一给总理写了个条子，请示上述事情，总理阅后即铅笔做了批示：同意并指出注意事项。<sup>1</sup>此件后来拍成照片，供调查人员外出调查时使用。据见过这一批件照片的校友说，总理的批示是：“可以调查，但不要公布材料。周恩来”。据赵建文说，原件在他手里，工宣队进校后，他将其上交了。

### （3）关于康生的条子

1967年4月1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这个会是针对4月10日聂元梓、孙蓬一向江青和陈伯达（戚本禹在场）状告关锋、王力“结党营私”，孙蓬一4.12讲话，以及4.13炮打谢富治事件，对北大进行批评的（相关讲话内容已刊登在《记忆》2015年11月15日第143期上）。就是在这个会上，康生写了一个条子传递给聂元梓，原文是：“聂元梓同志：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组织了调查彭真、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结果，看到旧北京市委内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黑帮的具体材料。请你们考虑，是否可行。康生四月十四日”。（笔者注：康生写的这个条子，在“北大校史展览”展出过，根本不是艾群先生所说的“新北大的一个革命组织要揪叛徒，望有关方面给看必要的材料，康生。”

关于康生的“揪叛徒”条子，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有一次，中央文革召开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会议，康生讲到“六十一人叛徒案”，讲南开大学的造反派抓叛徒怎么怎么样有功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北大应该成立抓叛徒组织。康生还写了一个条子，经过别的与会者递给我，也是抓叛徒的问题。这个条子，我给孙蓬一等人看过，带回学校后又给校文革常委看过。<sup>2</sup>

总之，揪叛徒是中共中央文件在先，周总理的批示在中，康生的条子在后。北大校文革就是根据这些文件和批示成立了“揪叛徒”的队伍，并经正式申报，办理了相关外出调

<sup>1</sup> 孙蓬一1976年12月11日写给胡宗式、章铎的信。

<sup>2</sup>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487页。

查和查阅历史档案的手续。<sup>1</sup>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

(1) 不是聂元梓主动要求揪叛徒，而是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求群众组织去揪叛徒。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没有一个是北大揪出来的。

(2) 艾群先生所说：“在聂元梓的授意下，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为叛徒”。请问艾群先生，聂元梓是怎样授意的？你所提到的“报告”在哪里？报告中是怎样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为叛徒的？你能拿出真凭实据吗？像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样级别的人物，他们的历史问题是一个群众组织能做结论的吗？党中央会仅仅根据一个群众组织的报告就做结论吗？群众组织按中央的指示办事，按当时的规矩，是合法的。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更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离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来讨论问题，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3) 以赵建文为队长的“除隐患战斗队”，是聂元梓、孙蓬一针对关锋、王力“结党营私”而专门成立的。它的根本任务就是调查吴传启一伙的问题，而吴传启属国民党特嫌，并不是叛徒。除隐患战斗队的任务同“揪叛徒”无关。“除隐患战斗队”在初期是秘密的，聂元梓根本不可能向康生报告该战斗队成立之事，更不可能在有许多群众组织头头参加的会议上宣扬此事。

按总理、康生指示成立的抓叛徒组织，起初命名为“北京大学揪叛徒兵团”，隶属于校文革。聂元梓回忆录写道：“这样，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非常严肃认真地对旧北京市委的领导干部包括彭真、刘仁等进行了一段审查，没有查出什么‘叛徒罪行’来。我们的结论是否定了康生的指示，旧北京市委没有隐藏许多叛徒。‘校文革’给康生写了一个调查结果的报告，就把康生指示的任务结束了。”<sup>2</sup>

<sup>1</sup>谢甲林：《谢甲林法学文集》，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3年，第46—48页。

<sup>2</sup>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488页。

“北京大学揪叛徒兵团”和“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大概是一套班子两个名称，笔者对其具体情况一无所知，也没和其中的任何人有过交往，只听说过第二战斗队后来归中央专案组领导。他们的材料从来没有公布过。艾群先生把“第二战斗队”与“除隐患战斗队”混为一谈，完全是张冠李戴。

(4) 艾群先生说聂元梓诬陷安子文为叛徒，更是驴唇不对马嘴。聂元梓的确揭发过安子文，揭发内容不是所谓安子文的“叛徒”问题，而是安子文与某个女人有不正常的关系的问题。这在《聂元梓回忆录》中有记述。至于上级如何处理聂元梓的举报，又查出来什么问题，这都与聂元梓无关了。至于江青在1967年9月1日讲话中说聂元梓揭发了安子文叛徒集团，那是江青的说法，江青为什么那么说，要问江青。聂元梓揭发安子文同一个女人有不正常关系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4、5月间，这是聂元梓个人的事情，同北大无关，同后来的“揪叛徒”更不相干。

#### 四、关于北大武斗

1968年3月28日—29日，北大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艾文”写道：“据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1968年3月28日夜，即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前夜，聂元梓在临湖轩向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头目下达指令：‘打，你们要打，就打吧！’从而发起3月29日大规模武斗”。“艾文”又写道：“事实上，聂元梓反革命案卷宗和《聂元梓回忆录》对聂元梓指挥武斗均有翔实的记载”。艾群先生闭口不谈这次武斗发生的原因和背景，不谈武斗发生的过程，不提“3.28”白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只说“3.28”夜里所谓的“临湖轩会议”，试图证明聂元梓下令挑起了北大武斗，并且指挥了武斗，可谓用心良苦。

我在《记忆》182期发表的《文革中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一文，已经详细记述了“3.28—3.29武斗”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我之所以质疑艾群先生，就

是关于“打，你们要打，就打吧”这句话是聂元梓的供述还是讯问者问话中要聂元梓交代的内容？至今为止，艾群先生没有拿出证据来回答。我向艾群先生提出的问题是：“聂元梓在司法机关讯问笔录”是何年何月何日、什么情况下的“笔录”？该“笔录”有多大的真实性？是不是逼、供、信的产物？你引用的内容，到底来自于讯问者的问话？还是来自于聂元梓回答的话？聂元梓本人有签字吗？所谓“临湖轩会议”，有几个人参加？都是谁？

我有理由提出我的疑问，因为我是“3.28—3.29”武斗的指挥者，但我丝毫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会议。

艾群先生趾高气扬地说：因为你没有必须知道的资格。聂元梓是校文革主任，是全校的最高领导人；你只是担任某个群众组织的临时职务——武斗总指挥，而且还是“之一”。校文革主任做什么事，有必要一件件告知你这个“之一”吗？《聂元梓回忆录》40万言，对你这个“之一”未着一字，可见你在她心目中是什么地位。她作决策，没必要告知你这个“之一”。

看来，艾群先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笔者没有参加那个所谓临湖轩的“会议”，而且连知道这件事情的资格都没有。虽然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但笔者仍然很想知道都有谁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什么没有人向我传达会议精神、下达武斗任务呢？聂元梓“批准”武斗、“指挥”武斗，又是通过谁去执行的呢？

实际上，艾群先生只是凭着他的特权去看了一点点档案而已。所谓“流程上的缜密合规”，只能说明经过“申请”、“批准”后看到一份“笔录”的过程是“合规”的，但绝不能保证该“笔录”“内容的客观真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是两派矛盾不断加深、对立情绪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并不是聂元梓的一句话就能打起来，也不是聂元梓一句话就能制止得了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威信最高，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人人知道，但许多地方仍然陷入了大规模的、甚至动用火器的武斗泥潭。

艾群先生在文章中又一次采用“模糊法”，忽悠读者，说什么：“事实上，聂元梓反革

命案卷宗和《聂元梓回忆录》对聂元梓指挥武斗均有翔实的记载，只是人民法院根据判决书的需要，没有一一列举而已”。

请艾群先生指出：《聂元梓回忆录》对聂元梓指挥武斗的“翔实的记载”在哪里？“聂元梓反革命案卷宗”对聂元梓指挥武斗的“翔实的记载”在哪里？

笔者在《聂元梓回忆录》中查到的，却是聂元梓在1968年3月25日逼着谢富治到北大制止七校万人涌入北大寻衅的记载，文字太长，兹不赘引。

另外，笔者还查到这样一段：“我被抓到监狱以后，第一个审问的事情就是武斗。不但说北大武斗是我搞的，还说我是陕西汉中武斗的后台！审了半截，我讲完制止武斗的全部情况，以及谢富治挑动北大武斗的经过，审问我的人都惊呆了。原来他们都以为，这下可抓住我这个大武斗的后台了，哪里知道事实正好相反！他们原先准备的材料都用不上了，预审员张口结舌，审问不下去，只好宣布暂时停止审问。以后也没有再追问下去。那位陈预审员后来对我说：‘你在制止武斗的事情上，还是立了一功的，你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吧。’我写了一份报告给党中央，交给陈预审员转交。”<sup>1</sup>

从聂元梓上述回忆可以看出，上峰和公安机关对于聂元梓“挑动武斗”、“指挥武斗”的罪行确实是非常看重的，一开始就审问武斗的问题，但真实情况和他们预料的相反，审讯人员听到聂元梓讲了他们原先从来不知道的情况，应该是很惊讶的，所以就暂停审问了。审讯人员当然不会只听聂元梓的一面之词，他们会去调查核实的，而调查的结果，却是要聂元梓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聂元梓写了一份报告给党中央并交陈预审员转交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核查的。

艾群先生称：“聂元梓指挥武斗均有翔实的记载，只是人民法院根据判决书的需要，没有一一列举而已。”真是这样的吗？请艾群先生解释一下，人民法院是根据判决书的哪些需要而“没有一一列举”的呢？

笔者查阅了相关文书，发现并不是“人民法院根据判决书的需要，没有一一列举”，而

<sup>1</sup>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264—267页。



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82）京检分审字第212号》根本就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起诉，《公诉人发言》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艾群先生能对此进行解释吗？该不会又是“人民检察院根据起诉书的需要，没有一一列举”吧？

检察院没有起诉的事情，法院当然不会判决，这和“判决书的需要”毫不相干。那么，对于艾群先生笔下“有翔实的记载”、铁证如山的大事件，检方为何未置一词呢？艾群先生言之凿凿的经过一系列手续看到的这些“翔实的记载”，检方没有看到吗？或者是，他们看到了更多的材料，知道了真相，决定回避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估计检察院也回答不了。因为当年的这种审判，起诉书也好，判决书也好，都来自上面的什么专案组，并不是检察院和法院独立办案的结果。

## 五、“程序上的缜密合理”，能够“确保内容的客观真实”吗？

“艾文”说：“上述内容的采访和公开发表，符合司法机关规定要求，符合新闻出版署的规定要求。程序上的缜密合理，确保内容的客观真实”。

“程序上的缜密合理”，就能确保内容的客观真实吗？那些假新闻、假成果、冤假错案，他们的发表及公布都有一套缜密的手续。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是中央专案组定的，是中央委员会公布的，开除刘少奇党籍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是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做出的，应该说程序很缜密吧？但确保内容的客观真实了吗？！

## 六、关于邓朴方遭受迫害致残问题

对于邓朴方遭受的迫害，“艾文”说：“聂还加紧了对邓小平子女的迫害。邓朴方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申辩的权利，开除党籍，刑讯逼供。邓朴方采取了当时唯一可行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愤慨和不平。他从楼上纵身一跳。”

邓朴方是我的校友和学长，他与我同系、同专业。文革中他受到迫害致残，令人痛心

和同情。

邓朴方于1968年8月跳楼的事，校内很快传开了，我也听到了消息。当时我到44楼拿我的东西，恰遇聂元梓和孙蓬一都在44楼，我就问他们：“邓朴方什么时候被抓的？”，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啊！”，我又问：“是谁抓的邓朴方？”仍然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啊！”。

关于邓朴方校友致残的过程，据我所知有三种说法：一是，被人推下楼去的；二是，沿着排水管往下爬，失手跌落的；第三就是艾群的说法：“纵身一跳”。

任何人抓捕、关押邓朴方都是错误的。按理说，如果认真追查，此事的真相是容易搞清楚的。什么人抓的邓朴方？为什么要抓邓朴方？是否是聂元梓指使的？此事至今没有公开事实真相。上世纪九十年代，面对外国记者的追问，邓朴方用“不愿提及伤心的往事”回避了这一问题。我猜想这可能与邓朴方同学不想殃及同窗的善意与良苦用心有关。

文革中，在派性驱使下北大发生了一些同学之间、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相互伤害的事件，是令人痛心的。但是把这些事情都扣在聂元梓头上是不公平的。正像庭审时官派的律师季全学、史兰生两位先生为其辩护说：“监改大院”和“专案组”的问题，我们认为她应负一定责任。但是，必须指出“监改大院”以及“专案组”进行的残酷的人身迫害，并不是在聂元梓的授意或策划下进行的。<sup>1</sup>

对于邓朴方遭受迫害问题，我毫不知情，不能妄议。但是，我对艾群先生的另一说法不能不提出异议，那就是“开除党籍”一说。请问艾群先生，文革中北大校、系两级没有党组织，群众组织有权力开除一个党员的党籍吗？你的根据是什么？

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古稀之人。过去，我们曾在派性的驱使下做过激烈的内斗，互有伤害，这是痛心的往事。今天，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书写北大文革史，把历史真相留给后人，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2017年10月

<sup>1</sup>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390页。

【述 往】

## 北大文革中“监听电话”纪实

胡志远 耿天鹏 温标 樊能廷

近日见到北大地球物理系井冈山十六纵队校友回忆“文革旧事”的文章（尚未发表，以下简称《十六纵文》，引文用楷体，不另注明），讲到“监听电话”的往事，它是我们撰写本文的缘起。

1967年8月17日，北大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打破了聂孙校文革的“一统视听”。从此北大分为两大派——“聂派”和“反聂派”，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主持了强扭的“大联合”。本文说的是井冈山兵团与校文革之间的斗争，每每有人把井冈山成立之前的事情，强拉硬扯到井冈山头上，那恐怕算不得“历史唯物主义”了。

聂元梓肚里的那一点儿文化水儿，本来只够搞些把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说成是“赫鲁晓夫《顿顿的静河》”；“负隅顽抗”说成“负隅顽抗”；“披荆斩棘”说成“披荆斩棘”；“红彤彤的新世界”说成“红丹丹的新世界”。聂元梓在1967年12月11日下午的“校文革党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又喊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为我们树立了“破公立私”榜样的口号。故而留下佚名诗：

混淆静顿本无意，颠倒公私是初心。

从来顽抗须负隅，方算披荆斩棘人。

却说1968年3月29日凌晨，聂元梓“红色权力机构”校文革麾下的新北大公社长矛队，经过精心预谋策划，全副武装的数百人马，在校医院西边的杂品库集结待命两个多小时，夤夜出兵。在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的里应外合下，发起突袭，把居住在31斋的手无寸铁的井冈山学生二三百人殴打、杀伤、抄家、驱赶出楼。制造了北大校内的第一场大武斗，把长期的“文攻内阅”搞成暴烈的“武斗内战”，井冈山这个群众组织，伤者逾百，无家可

归，财产损失无数。这就是北大文革史上著名的“3·29事件”。

昔“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刊载于网刊《记忆》114期，承认：从1968年3月29日开始，北大校内的两派开始武斗。

“3·29事件”单从31斋“一城一地”得失看，宫香政率队，聂派武斗队完胜，打得漂亮，夜袭“血洗”井冈山，拿下了31斋，由宫香政率领长矛队守备，又顺手牵羊，武力拿下29斋。校文革武斗总指挥、哲学系教师高云鹏兴奋唱凯：“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换到政治角度看，聂孙校文革发动武斗夺楼，是一个其蠢无比的败着。一举伤害了反对派数百上千人，伤者愈众，血仇愈深，镜子打破了，是圆不起来的。众多受害者，忍受锥心之痛，怀恨聂孙，同仇敌忾，抱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信念，结成坚不可摧的反抗力量。聂孙灭得了井冈山吗？绝无可能！

聂元梓曾经对清华大学团派头头吐露心曲：“我们知道打不垮井冈山，不过想将来搞联合时新北大公社能占优势。”

依靠武力，打，是个办法吗？实际上，从“一城一地”得失看，打，也不是个办法。被殴打、驱赶出31斋和29斋的井冈山化学系和数学力学系学生，并没有逃离北大，数百上千“失林之鸟”在寒夜挨冻，天亮之后，赤手空拳，理直气壮，唾手而得，拿下30斋和32斋栖身。无线电系学生进驻35斋。青年工人“小海燕”3·29当天中午就势清理28斋。这样，井冈山一方3·29当天就“不战而下”四座楼。3·29之前，聂孙校文革没有给井冈山这几千人的群众组织划拨过一处活动场地，没给井冈山划拨过一分钱活动经费。3·29之后，井冈山顺风扯帆，不动干戈，接连“不战而下”，拿下37斋和36斋。六座楼盘，构成了井冈山的“割据区域”。

聂孙校文革3·29这么一打，开衅不义，打碎了自己原来基本安稳的一统江山——本来，3·25“地派”各校的外力寻衅，是打不破聂氏一统江山的。

述及北大1968年3·29武斗的回忆、反思文章，数以十百计，唯独聂元梓和她个别拥

竟，一口咬定北大武斗始于3·25——死不承认文革罪行的立场，决定了他们，一直在歪曲史实。



“3·29事件”之后，井冈山据守28斋、30斋、32斋、35斋、36斋、37斋六座学生宿舍楼，被聂派武力紧紧围困，双方割据对峙四个月之久（见图1。）井冈山这六座楼盘，“地盘”约可五、六千平方米。聂派占据燕园校区从西校门到东北门，大概是1.2公里；从南校门到朗润园北墙，大概是2公里，“地盘”约可二百四十万平方米——还不包括西门颐和

园路之西的蔚秀园、畅春园、畅春新园、承泽园，也不包括中关村北大街之东的燕东园、中关园、中关新园——也就是说，按照“兄弟阋墙”院墙之内的“地盘”算，聂派远远超过井冈山的400倍以上。

北大四个月的武斗期间，事端叠出，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依仗暴力，残杀了与武斗无涉、完全无辜的青年学子温家驹、殷文杰和刘玮。聂派武斗队发起4月26日的36斋夺楼大武斗、5月2日的“破袭”37斋井冈山“寨门”大武斗、6月24日的抢劫粮菜运输车大武斗、7月22日和23日破坏井冈山从校外电线杆11千伏带电接电的大武斗，等等。每一起武斗，都是强势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挑起、发动、主动进攻，强加于弱势的井冈山兵团。

北大两派戈矛相对的武斗之外，还有种种“智斗”。

笔者把“监听电话”旧事，较为详细地考察了一回，记述如下，请当初亲历的知情者指正。其实就是讲究个“天下最不能欺世的，就是文字”的意思。

《十六纵文》提到“04纵队的狐狸”。那就先把“狐狸”交代一下，因为“监听电话”故实正是由他而起的。诨号“狐狸”的这位同学，是生物系学生。讲起他怎么到的生物系，又有隐情：他报考北大的三个专业志愿，依次是无线电系、物理系、生物系。北大录取他

的时候，颁榜生物系，他说算是生物系“捷足先登”。他仍然对于无线电，情有所钟。

文革之前，大概1964年或1965年，北大敷设电话线，从北往南，沿着29斋、30斋东墙刨沟埋线，“狐狸”在大饭厅吃饭，来来回回路过施工现场，看在眼里，不觉，下意识地记在了心中。



井冈山兵团简陋的电话总机房

北大文革“3·29事件”之后，两派“武装割据”，井冈山“割据”区域六座楼房都是学生宿舍，电话线全部被掌权的聂派切断。井冈山这边，失去电话这个内外通讯手段，很抓瞎。就由“狐狸”主持，现学现做，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组装了一个人工接插的电话交换机，也叫作“总机”，安放在28斋四层的南横楼，单独占用一间屋子，叫

作“总机房”（见图2）。从图片可以清楚看到，一个木板旧抽屉，立起来，成为小交换机的“电器柜”。小交换机有外线。但六座楼之间的通话、联络，都要通过这个简陋的人工交换机。井冈山头头们经常通过这里联络各楼。“总机房”里有一个小小的电风扇，是“特殊的待遇”。因为“总机房”在四楼最西北角的房间，天桥入口处，迎面是窗户，西晒得厉害。

“狐狸”还和小伙伴一起，捡拾新北大公社广播车废弃的一台摔坏的汽油发电机，标牌功率3000伏安。他和数力系学生小戊自己动手，修理了损坏的化油器——发电机居然又运转发电了。这一台发电机，在聂派随意操弄权柄、随心所欲地给井冈山区域断电的关键时刻，很能发挥作用。它的供电线路与学校的线路是分开的，发电机220伏电压的“市电”，单独走线，支撑着明面上井冈山电话总机房、井冈山广播台和37斋两架探照灯的用电。秘密地，还供应“电话监听室”的用电。

这样，“反聂派”井冈山与“聂派”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既有大面上的对垒，另外还有“秘密战线”的“谍战”。

井冈山在3·29被偷袭，惊魂甫定、“武装割据”局面初成。大概是4月中旬，不知怎

的，“狐狸”忽然想起，亲眼所见沿着29斋、30斋东墙刨沟埋线的电话缆线，应该有文章可做。如果简单地破坏它，只需把电话缆线充气的铅质套管扎几个眼儿，让它透了气，用不了多久，电缆就被地下潮气侵蚀而报废。另一个思路是，对电话电缆不作破坏，在电缆线上动动手脚，接线监听，很是个好主意。

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说干就干，“狐狸”没有向井冈山头头们报告，悄悄找自己广播台的伙伴一合计，动起手来。

整个60年代，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左倾思潮高涨，社会主义国家逐一“变修”，国内正是伟大领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倡扬“天下大乱”，党不成党、政不成政、“治病无良医，治世无良相”的混乱局面。“狐狸”等人搞的“监听”，当然没有任何当局合法授权，属于“无政府主义”。

当时30斋是井冈山占领区，就从30斋这里下手。30斋是东西长条“一字形”的四层“筒子楼”，一层、二层的东半截，是共青团校团委和校学生会办公的地方。井冈山进入以后，只有寥寥的守楼学生居住，一层根本没有人住。一层最东头、门对门两间宿舍空置，“监听室”就是东南角这一间了！井冈山广播台机务组“狐狸”，秘密地找来化学系学生大鹏和寿彭两个英武的壮汉。布置给这两个人“绝密任务”挖地洞，对谁也不许说。先用上下铺的双人床，堆塞一些破烂家具，在东半截楼道隔断一楼最东头两间（门对门）屋子。从二楼水泥地板，打洞洞穿，通向一楼“监听室”的对门房间，架上木梯上二楼，作为有关人员的出入孔道。二楼这间地板打洞、放梯子的房间，房门一锁，谁也进不去。

寿彭说：“我经历了井冈山搞电话监听的前期工作，挖地洞找出电话电缆。大概是68年3·29之后的一天，井冈山广播台的“狐狸”来37楼找我（4·26之后我们03纵队驻守37楼），叫我再找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和我一起到30楼挖地道寻电话电缆搞监听。”

寿彭、大鹏两个人每天在37斋化学系4年级食堂吃完饭就消失。吃下一顿饭的时候按时回来，满身泥土，吃得特别多。不论谁问，也不说自己干什么去了。地洞长度有限，从30斋一楼屋里水泥地板挖下去、往东南拐、从墙础下面出去，直达电话电缆线，也就三米

左右。没几天就挖完了。挖出的黄土，回填地洞一部分，用以加固由木板堵塞的“监听室”窗户，又倾倒在堵塞楼道的破烂家具堆里，不显山、不显水。寿彭说，“我俩先用大锤捶开30楼那个房间的水泥地板，然后挖竖井，再后向东南方向挖地洞。好像挖了三天，洞端出现了电缆。我们叫来“狐狸”，做个交代。自己收工回37楼，答应保证绝对保密。”

电缆在三十楼东南“把角”转弯，所以电缆剥开后，比较容易接线（转弯处拉直了就会多出一段来）。

地洞挖到的这一根电话电缆是由学校总机分设的支线，专业术语称作“百对线”，黑色胶管内里，走101对“一红一白”的电话线。每一根铜线斜裹缠绕着高档的窄纸条作为绝缘层，外面有厚橡胶管包裹层保护，再外面是充气的金属铅套管，铅套管外面，还有黑铁皮套管。黑铁皮套管外面，还有沥青缠麻绝缘层。这101对线，要用万用电表测量——凡是有电压的，就是有电话的；没有电压的是空线，没有接到学校总机上。用电表仔细甄选完了，有电话的，不到20对线。这些线一一接通到监听室里。

后续的活儿，监听放大器由无线电系60级学生金榜和62级学生甘霖设计、制造。到西单商场买来塑料细导线，5分钱一米，还有二三十个日光灯启辉器，作为灯光闪烁提示。另买了十来个6N2双三极管做成二十路放大器。这样，监听的时候，有了功率增益补偿，通话者觉察不到音量的损失。

从这里“路过”的电话，都成为“旁听”对象、“谍战”的内容。

“监听电话工程”的“电器柜”跟电话总机一样，也是用一个木板抽屉，竖着，用木罗丝拧在桌上。里面安装上述双三极管和日光灯氖泡做指示，安装上二十个插孔。只要有电话通话，氖灯就会亮，把耳机插进插孔，这样就可以监听了，与此同时也可以录音。

28斋原来是越南留学生宿舍，留学生办公室就在楼里，有几十台录音机可以随使用。录音机型号好像是601，是上海广播器材厂生产的。磁带也有的是，很多，是德国进口的。

“狐狸”接线、安装用于“监听”的土造“设备”，用一张大二屉桌当作“操作台”。井冈山各级头头们起先一无所知，“狐狸”说起来，忍不住嗤笑自己——小聪明”、“最无政



府主义了”。

大家同仇敌忾，积极性无比高涨，整个的工程从头到尾，快马加鞭，简直是“神速”。

初期监听到的电话，用记录本笔录下来，最后竟至有四五十本之多。“监听工程”正式开始，没几天，报告给总部个别头头知道。

听到的电话，对于频繁的私人通话、打情骂俏之类，就不作记录，只是“旁听”。涉及到工作的“公事”，就“监听加笔录”。特别重要的，比如涉及到武斗的行动和部署等信息，就用录音机录下来。后来，录音机就整天整夜开着。

寿彭说：有一次，广播台一个人带我俩去参观。十几组，有指示灯、有录音机插孔。桌子右边有一台录音机，旁边一大摞录音带。监听的同学坐在里面，头戴耳机，根据指示灯闪烁判定电话的到来。重要的电话就录下来。

这“百对”电话线，刚好通向包围井冈山“割据区”的各楼，这个监听，对于被“围剿”的井冈山，生存和坚持下来，具有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算“过甚其辞”。

“监听室”配有一部电话机，有情况了，经过28斋总机房，向井冈山总部（武斗期间在28斋坚持工作的）头头报告。此时，坚持工作的井冈山头头并不多。因为，此前，江青说过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新北大公社是个很好的群众组织”。加上聂派各种会议、文字、标语和广播几个月大轰大嗡的声嘶力竭喧嚷，诬蔑井冈山为“老保组织、反动小集团”，某种程度上蒙蔽了很多，怀疑或考量井冈山是否有“政治问题”。

井冈山的头头们，确实有个别消极、甚至“闪避”的。例如，井冈山总部委员、俄语系研究生徐运朴，是最早的“校文革”成员、“举义”加入井冈山，回了黑龙江老家。武斗期间，被聂元梓校文革派遣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人员，从老家抓回北大，诬蔑为“反革命分子”，酷刑逼供，打断了腿骨，写下《徐运朴的认罪书》，刊载于1968年7月17日校刊《新北大》第四版。1968年7月18日，在东操场，徐运朴被大箩筐抬着上台，接受聂派声称的“全校大会公审批斗”。1968年7月23日校刊《新北大》第三版、第四版，整整两版，刊载《我校首次公审操纵北大井冈山的现行反革命重要成员牛泰升、王忠林、徐运朴》。

具体“监听电话”人员，是国际政治系学生小颺和地质地理系一位女生，两个人，每天24小时值守。他俩接手之前，是“狐狸”调试设备。“狐狸”安装完成后，在技术上做保障，具体监听就没介入，但是他又时时关切“信息”。小颺接手“监听”工作，建立记录制度。小颺和寿彭都证实，“监听室”窗户堵死，屋里“乌漆抹黑”，24小时需要灯光照明，工作条件十分简陋。“监听室”常备一根护身的长矛，防止窗户被破袭，小颺说，“真是枕戈待旦呀”。

现在追忆往昔，“监听电话”是什么时候“开张”的？确切日期，想不准了，大的事件还是能够想得起来。

《十六纵文》说“5.1那天，王书仁在36楼前值班，04纵队的狐狸向我要三极管。”而“狐狸”说：“‘监听电话’应该是4·26之前开始的，因为4·27无辜的路人殷文杰被聂派杀死，是我首先从‘监听电话’得到的消息”。“狐狸”还说：“用几十个三极管，不可能向王书仁个人要。”

井冈山总部办公室人员小颺说自己，“接手监听，肯定是5月份，谁带我去的，记不住了。到那儿的时候，那儿一个人也没有。肯定有懂技术的人带我去，教我怎么使用和运行。”

《十六纵文》中“为了了解聂元梓武斗队的动态，井冈山总部决定从28楼挖一条秘密地道，通往29楼东南角的电话电缆接头，监听该电缆链接的每一个电话。”这一段记述有误。实际情况是，秘密挖地洞、进行“监听电话工程”，是“狐狸”等人的自主行为、自行其是，井冈山总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也就是“狐狸”嗤笑自己的“小聪明”、“最无政府主义了”。当然，“监听工程”成事之后，总部十分重视、十分支持。关于“监听电话室”的地址，就近设置在30斋一层最东南角那一间屋子，而不是《十六纵文》说的“29楼东南角”。

“通过监听电话，挫败聂元梓武斗队的偷袭”，举其大者是两次。一次，正如《十六纵文》所述，井冈山知悉对方要乘夜“破袭”寨门，就在37斋院墙豁口外，提前二十分钟设伏，击溃了聂派武斗队一大群人手持消防斧的“强拆”、“破袭”行动。另一次，电话里听

到的直接信息极为简略，是聂派武斗队悍将王刚的一句话，“十二点叫我起床”。聂派武斗队“钢一连连长”王刚半夜十二点起床干什么？监听人员分析，一定是聂派武斗队有“夜袭”行动。消息报告给井冈山头头，头头做了针锋相对的应急部署——集中优势兵力，迎击对方的“夜袭”。在另一个战场，保卫36、37斋之间木床通道“砦栅”的守楼学生，过早暴露了埋伏，惊动了王刚。王刚指挥着执行“破袭”任务的武斗队及时退兵，避免了恶战、死伤甚至“丧师辱社”的结果。

通过监听电话，识破了“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起义”过来的两名“女谍”。一天，一个“女谍”在36楼的地球物理系16纵队的“战时食堂”内呆着。“玫瑰”害怕她给大家下毒，就布置“蔷薇”监视她，“蔷薇”装作进去扫地，引起这个“女谍”的警觉，从此，两名“女谍”不辞而别，离开了36斋，再也不曾露面。

小颺监听电话，亲闻宫香政在电话中自报名号，“我是宫香政”，向34斋布置武斗有关事宜，但是手头没有记录本和录音带，时间和事件内容，都回想不起来了。宫香政现今说自己“武斗中，除了3·28、3·29，别的什么也没参与”，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谎话。井冈山“监听电话工程”，在3·28、3·29后二十多天“开张”，负责监听的小颺二人都说，“听到宫香政电话最多了，我们每次都记错名字，写成吉祥的‘祥’，或者详细的‘详’。始终不知道是香臭的‘香’。到现在也没见过这个人。武斗期间宫香政电话最多，倒是没听到聂元梓亲自部署武斗行动的电话。”宫香政在北大武斗中，作为副总指挥，始终担负重大的武斗责任，现如今，他写一些矢口否认的文字发表，力图抹杀历史真相。

小颺监听电话，五月间，亲自听到聂元梓布置，第二天中科院大操场开大型批斗会，要借机诬陷“井冈山破坏会议”。井冈山紧急应对，先发制人，抢先广播第二天聂派要破坏中科院的批斗会。聂元梓的电话失密，给她用以陷害井冈山的部署掣了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哑巴吃了黄连。其实井冈山被紧紧围困，根本不知道中科院这个批斗会是什么。

情况紧急的时候，“监听电话”根本来不及报告总部再做筹划区处，就由监听人直接把情况告知相关“前敌”人员去处置。

1968年5月2日，北大南墙两个出口的聂派武斗队，同时涌出，向井冈山37斋的“寨门”实施夹击。小颼监听到对方出兵电话，来不及报告总部，就通知值守“寨门”的化学系学生克信：“对方要对大门采取行动，加强戒备。”克信站在37斋楼外平地，向楼上大声呼喊报警，霎时间，二三十个守楼的化学系学生持戈驰援。用长竹竿和撑杆跳杆与那些涌到“砦栅”跟前的聂派武斗队“战士”们，隔着架子床，对刺、拼杀一阵，双方各自有一些人员轻伤。聂派武斗队占不到便宜，快快退兵。克信知道小颼是总部办公室人员，总部头头交代过，“小颼电话说怎么弄，你们就怎么弄。”不读我们这篇文章，也许克信永远不知道，那么准确的情报，是“监听电话”得来的。

“监听电话工程”有一个代号“了望哨”，很少用到。除了井冈山总部一两个头头和监听者本人，谁也不知道神秘的“了望哨”在校内、校外或者什么地方。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向追问情报来源的自己人，透露一点儿——情报来自“了望哨”，闪烁其词。井冈山总部和各楼的电话，都是明面上的，公知公晓。此外，唯一秘密的，就是“监听电话”——神秘的“了望哨”。

1968年6月24日，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忽然“寨门”外海淀路的马路边，停靠了一辆卡车，满载着粮食和蔬菜。这是化学系的总部委员，自己筹款买了东西，自己雇车拉回来，别人谁都不知道。临街的37斋，住的基本上是化学系学生，穿着汗衫、小背心，纷纷空手跑下楼来卸车。两边出口监视井冈山寨门的聂派武斗队，电话报告了他们的头头。他们的头头判断“井冈山运输武斗物质”，立即调动重兵，东西两面夹击。小颼监听到的电话，报到井冈山总部，头头不知内情，也发懵，决定经由地道紧急运兵奔赴前敌。此役，打得不甚激烈，驰援的学生，与楼内的学生一起，合力卸车，把一卡车粮食、蔬菜等物资，完整抢运进楼里。承运方“运输三场”的卡车，被头戴柳条帽、穿着制式黄色军棉袄的聂派武斗队长矛扎破轮胎放气，驾驶室被砸，司机被拉出车子，被殴打、被刺伤为气胸。后来听说北大校文革派人到“运输三场”登门道歉，作了赔偿。这一仗，井冈山为了吃饭而不得不流血，有七八个学生被刺伤。化学系小沪同学丰腴肉厚，屁股和大腿被长矛扎了十

几个（钉子扎了似的）小眼儿。给他的伤口涂碘酒的时候，深处，一根棉签探不到底，上药疼得他满脑袋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下来。“英雄流血不流泪”，伤员们没有一个因为受伤疼痛而落泪的。

1968年7月20日，地质地理系毕业生刘玮，从天津来校办手续，大白天在海淀街上，被聂派武斗队绑架，在40斋聂派武斗队“西线指挥部”，被铁器残酷地轮番殴打致死。井冈山得到“监听电话”消息，是聂派武斗队施刑打手看着刘玮不行了，电话报告武斗副总指挥黄元庄，黄在电话中吩咐施刑的打手：“用冷水把他泼醒，给他喂一点儿西瓜。”

1968年7月23日的夜间，井冈山上电线杆接电的技术物理系桂同学、虎同学、霖同学，冒险攀爬供电局专业的长竹梯“升空”，做11千伏高压带电作业。两边校门涌出数百名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海淀路北边人行道上的高压电线杆合围。预先集结的井冈山守楼学生，背对高压线杆，围成密密匝匝的人墙，挥戈拼命抗击，保护接电的同学。情势危急，正可谓“千钧一发”。井冈山一方的高压电还没接通，依靠自备发电机发出的220伏“市电”，供应“前敌”探照灯照明。将近二十台大型弹弓连续发弹制敌。高音喇叭竭力嘶吼，空中矢石交飞，看一眼这种情景，热血在胸膛里就会不由自主地沸腾起来。

聂派武斗队，用高压水枪开路。高压水枪的威力，据说能够把30米外站立的人致伤和击倒。

突然，周遭“聂占区”的电，一下子全断了，高压水枪就变成“聋子的耳朵”，高压水枪伤害学生的恶行被终止。这时候，聂派领导层，正在西校门里的办公楼礼堂开什么会。学生宿舍的“井占区”早就被停电，没有灯光。这突然之间，“聂占区”高压线路短路，立马一片漆黑。小颀监听电话，听到对方电话来来往往，不暇应接，已然是“捣了蜂巢”、乱成一团。聂派被断电而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时候，“监听电话”听到聂派有人凶险地主张把“坦克车”开动出去，到“前线”去冲撞、碾压井冈山的“木床工事”，也有不同意这么干的，电话里吵得一塌糊涂。到底没听明白，出动坦克车的主张，被谁制止或者怎么作罢了。聂派准备好的一台1500伏安发电机，天意弄人，关键时刻因为一粒细沙子落进了要害

部位，运转不起来。

后方被袭，大面积断电，查来查去，不知原委，很动摇聂派“前线将士”的军心和士气。阵脚渐乱，腿脚发软，攻势受牵制而转弱。“聂占区”断电，实际上，给“武力”弱勢的井冈山前线，极大的奥援。

此役，事先“监听电话”得知，聂派电话下令使用“燃烧瓶”，小颀立即通知了化学系学生克信，叫他做好充分准备。所以傍黑的时候，把“工事”一张张木床的床腿相互连接、用铁丝捆绑结实，都用水泼湿。并且告知大家，今天聂派将使用“燃烧瓶”，守楼学生心里都有所戒备，自己也制作了燃烧瓶。

失掉了高压水枪开路的优势，聂派武斗队“步队”进攻之前，“炮火准备”，投掷了数以百计的“燃烧瓶”。葡萄糖水瓶充填乙醚之类的含氧燃料，着火点低，投掷出去，由瓶口化学物质白磷发火。但是燃烧的火焰温度比较低，井冈山用以抵抗进攻的潮湿木床工事，没有被点燃。时下影视节目，看到演员浑身着火的镜头，可能就是这类东西。还有眼疾手快的同学，捡拾起聂派武斗队扔过来的燃烧瓶，原封不动地投掷“回敬”过去。井冈山一方是用汽油做燃料，瓶口裹上纱布绷带，点着火以后再投掷出去。聂派武斗队排兵布阵在马路上，有的是空地，对于燃烧瓶，闪避开，就是了。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2008版第789页记述，“双方用长矛相互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实际是持续到拂晓。聂派武斗队拥有自制“坦克车”的事情，《北京大学纪事》没有记载。

此夜，双方鏖兵，聂派武斗队的攻势，受到“被断电”的牵制，躬身感受，尝到“被断电”的滋味。攻势三鼓而竭。井冈山勇士桂同学、虎同学、霖同学冒死在11千伏高压线上带电接电成功，“井占区”突然灯火齐明、大喇叭欢快奏乐，欢声雷动，一舒压抑，久久没有过的畅快。小华说：723接电，我在37楼顶层临时广播室（或称临时指挥部）喊了一整夜，传达头头们指挥命令、告知前线东西两翼对方的动向、不断鼓舞我方士气。接电成功那一刹那，广播台毛毛和王纪那嘹亮，又震撼人心的“接电成功!!!”的声音响彻北大上

空时，我的嗓子已经全哑了。

翻回头，交代一下“聂占区”断电的情节和因由：“狐狸”在37斋“观战”，聂派武斗队的高压水枪威力巨大、一往无前，冲洗了马路上撒布的豆子，直指遮断海淀路的木床工事。“狐狸”见状，想起抵御高压水枪的预案，赶快打电话给28斋的小戊和小白，通知他俩“实施预案”。俩人接到“通知”，立刻实施——从28斋4楼北窗往下，瞄准了，往东西向的高压线扔出铝管。高压线外面没有绝缘层，天助，铝管刚好同时搭到两根高压线，造成短路。迸起一个大火球，“聂占区”跳闸断电了。

此前几天，在“监听电话”中，听到“公社武斗队”在“学三食堂”试验高压水枪——消防水龙，串接高压水泵，加压再喷出。据聂派武斗队通话人在电话里讲，30米内，人都站不住。监听到这个消息，“狐狸”就想起了校内高压线正好在井冈山总部28斋楼房北侧经过、转弯，如果短路这一条高压线、停掉全校的供电，必然把自备井供水也停了，聂派武斗队的高压水枪就没法使用了。几个人一讨论，形成了一个应对高压水枪的“防御水枪预案”。

实施“防御水枪预案”，停全校的电，不是为了报复聂派，而是为了抵御他们使用高压水枪，确实是“制侵陵”的无奈之举。7·23夜间，聂派武斗队使用高压水枪杀伤（在现场保护接电的）对立派学生，逼迫得“狐狸”等人按照预案停全校的电。停“聂占区”的电，本来是与院墙外面（井冈山）接电无关的两件事，赶上井冈山接电的过程中，聂派武斗队破坏接电、使用高压水枪伤人，井冈山方面迫不得已，制造了校内高压线短路，断了“聂占区”的供电，制止了高压水枪的暴力侵袭，真真实实“救人于水火”。如果不是聂派武斗队使用高压水枪伤人，就不会有校内高压电线短路。

俗话说“水火无情”，7·23聂派武斗队动用高压水枪对于井冈山接电的学生作“水攻”，又动用燃烧瓶对于井冈山接电的学生作“火攻”，都是为了杀伤对立派学生。幸而校文革坦克车没有出动“前敌参战”，不然，一夜之间，酿成几多人命血案，难以预料。

《十六纵文》记述断电的事儿：“7月23日接电成功后，井冈山广播台的两个机务：

04 纵队的狐狸和 16 纵队的李大明，站在 28 楼的楼顶，楼下的北面就是聂元梓控制区的供电线路，他俩把一个带钩子的钢筋扔了下去，正好挂在高压线上，搭在两根电线上，引起一个火花，聂元梓的控制区就断电了，现在是井冈山控制区灯火通明，而聂元梓控制区漆黑一片。”

《十六纵文》这一段行文有几处不确：①“聂占区”断电，发生在井冈山接电过程中，学生遭受对方高压水枪攻击、难以招架之际，而不是接电成功之后；②实施断电“作业”的人员是数力系学生小戊和小白，而不是胡志远和李大林；③小戊和小白二人是在 28 斋四层朝北的窗户进行的“断电作业”，而不是房顶；④断电“器材”是铝管，而不是带钩子的钢筋。这些反复核实的情节，提供给《十六纵文》作者参详。

校文革财大气粗，拿着好好的汽车改装成为“作战坦克”，井冈山则苦于运送伤员没有机动车。武斗中井冈山有人受伤，需要送到花园北路的“北医三院”或者海淀黄庄的“海淀医院”，天可怜见，没有机动车辆，完全靠人工担架抬伤员。如果担架被聂派武力劫持，怎么办？

一场“竹枪”对长矛拼杀方罢，只见一副担架抬着一个人出 37 斋，向 34 斋方向慢慢地走去，“狐狸”等人在监听电话室紧张地谛听动静。驻守 34 斋的聂派生物系武斗队，打电话向上报告、请示：“有井冈山的担架抬着伤员路过，截不截？”上面回复道：“不要截。如果截到的伤员死在咱们手上，麻烦大了。”不大功夫，第二副担架抬着伤员，顺利地路过 34 斋和海淀绣花社往东去了。不大功夫，第三副担架，同样顺利地路过 34 斋和海淀绣花社往东去了。这样，井冈山的伤员都安全地运送出去了。

其实，第一副担架，是个“侦察气球”，担架抬着个好人，连同抬担架的俩人短衫短裤，准备一旦遭劫，立即扔下担架往回跑。对方顶盔重甲、大夏天穿着军棉袄的长矛队，无论如何追不上我空身人。这也是“狐狸”自嘲的“小计谋”。

聂元梓校文革，在文革中自称为“红色权力机构”，发动武斗，镇压弱势的对立派，妄图予以“武力剿灭”。早在 1967 年 12 月初，聂元梓就胆大包天的放话：“打吧，打死几个



也不要紧，顶多中央批评我几句。”随之，1967年12月8日晚间，聂元梓的得力打手、新北大公社红17团团长江香政率领数十名棍徒冲进属于中科院的中关村印刷厂，暴力驱赶正在印制《毛主席诗词集注》的井冈山学生，把印刷车间的成品《集注》肆意地撕毁和践踏。

聂元梓校文革滥用“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向对立派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文的不行，就来武的，早有武斗思想和武斗准备。宣传恫吓、谣言攻势、收买人心，不见成效。聂派在北大发动一场又一场大规模武斗，妄求“武统”，扼杀井冈山的反抗，成效很值得怀疑。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被反聂派秘密监听了电话、“分享”了信息，这些“监听”和应对措施，抑制、消减了聂派发起的每一场武斗攻势，使之屡屡大打折扣，还要在内部排查“内奸”。井冈山这个群众组织，毫无政治后台、毫无后勤保障，能够坚持着、咬牙扛着，到7·28，最终，总算粉碎了聂派“武力围剿”梦，存活下来。说来，也算是一种“异数”。



井冈山很多人，以及友人，曾经在武斗期间，更多是在武斗结束以后，在37斋门洞南面照相。照片背景是红底白字仿毛体的“井冈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门柱”。窃以为这个口号，不如解读为“井冈山的同志们，将活命进行到底”。

这张照片（见图3）是沈庠，外校学生，以笔名“理胜”，著文《忆北大文革旧事》；他是北大老前辈、大书法家沈尹默的后人，他也是最早写北大文革网文的作者。这张照片，可以清晰地对于北大文革武斗期间井冈山37斋“窥门墙”。沈庠站脚之处，多次发生

过长矛矢石、裂盔穿甲、抗暴求存的拼搏。

井冈山的“监听电话工程”，不仅对于井冈山“功莫大焉”——“监听电话工程”事先侦知对方动态，井冈山一方有所准备地应对，抑制、消减了每一场武斗的规模和烈度，其

实对于聂派，实在“德莫厚焉”——它减少了聂派武斗人员的伤亡，抑制了武斗队的进一步作恶。请聂派细想想，真的应该对于井冈山的“监听电话工程”，有几分感恩戴德。认真比较一下，温文尔雅的大学者周培源和研究生侯汉清担当井冈山的头头，始终不弃“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人道情怀，谨守“任其退、我不追”的作战方略，比起聂派孙蓬一、黄元庄、宫香政等人“赶尽杀绝”的恣意屠戮戕害，实在有天壤之别。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里对季羨林的《牛棚杂忆》发表了这样的看法：“说到我的其它事情，季羨林也有许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其实，我并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头头。”看到聂元梓这些违背事实的负心言语，那些在北大文革武斗中，为聂孙校文革“效命疆场”的“公社战士”，是不是应该悲从中来、痛哭一场呀。

话题转回“监听电话”。工宣队进校后，两个工宣队员，半夜到28斋403室上门搜查。“监听电话”用大号美术字在封面作了编号的“流水账”，几十个记录本，一大堆，就都“上缴”了。小颀特别向这两个工宣队员强调，这些电话记录非常重要，务必妥善保管、上交给领导。大量《电话监听笔录》和对应的录音带，都是聂派在武斗期间若干所作所为的确凿证据，一个字也抵赖不掉。这些材料，按照制度，藏入北大档案馆。恰如《十六纵文》所言，后来，“这个监听工程还真的起了大作用”“监听录音是定性校文革是武斗文革、派文革、逼供信文革的铁证。”

小颀说，工宣队进校后，搞“大联合”，他曾经写过一张大字报，“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蜻蜓点水地披露了《井冈山监听局部电话》。没有留下大字报文稿，是一件大可惜的事情。

“监听电话”走线的地洞回填不实，没几个月，那个地方就自行塌陷了。

我们写的这篇纪实，如果有史实上的任何差错或出入，诚请知情者指正。■

【述往】

##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一）

陆伟国

### 3. 摧落的花

这段时间里，我们系的男生依然住在三楼（东风三楼的三层楼），她们女生在二楼。我们班有位美丽如花的女同学，这期间有段不一般的经历。在没有她同意的情况下，我不能更多地叙述她的事情。但想说的是，这决不是通常“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焰”的老套故事。因为她和一位外国留学生交了朋友，有所往来，被留学生楼的管理员告发，竟然引起了安全机关的关注，怀疑她“向国外泄露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令对她和她的男友，两个都要抓，尽管她本人是归国华侨、而那位留学生还是某国左派组织负责人的后代。抓捕的方式是警察不出面，以“革命群众”扭送公安部门的办法来进行。这个“任务”由我系的低年级同学承担了（是不是有我们班的同学带路，还不能确定）。他们暗暗盯梢，在这位女同学进到留学生宿舍后，等到晚上再一拥而上，砸门而入（还有几个同学则从屋外翻窗而入），把躲在大衣柜里的她拖了出来。在所谓“扭送”的时候，她被拖到操场上当众进行极其残暴的毒打围殴，衣服被一绺绺地撕碎，头发被一把把地揪下，几近裸体，残忍至极。

在被公安部门拘押了很长一段日子之后，没有审查出所谓“向国外泄露国内文化大革命情况”的问题，她又重回学校。我下去看她的时候，她给我看了她保存下来的一绺被撕下的头发，语言很平静。我没有劝慰她，我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劝慰她。在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任何的劝慰都是苍白无力的。她能这样地面对，已经说明了她的坚强。

她还告诉我，在被抓之前，她外出进城看她姐姐时，已经被多次盯梢。她都已经认出盯梢的人，就是我系低年级的某个自以为有“公安工作遗传潜质”的人。在多次的被盯梢中，她也学会了在街上走路时，从橱窗看身后的人影，再突然回头反方向走，使盯梢的人

愣在那儿、不知所措。这个低年级同学当“特务”的伎俩实在是很不成熟。她说，有次她发现后面有盯梢的，便临时突然上了辆公交车，盯梢的人迫不及防也跟着上车而兜里却没准备买票的钱，便跟那售票员吵了起来。她一看，又是这么回事，就立即转身下车，把那人甩在了车上继续跟售票员吵。

现在的人们，谁能想到那年那月，同学之间竟会演变成这种关系。或许，正是盯梢者几次挫败而心生怨恨，加重了后来对她围殴的凶残。

#### 4. “声名大作”

学校里，看似平静一些，却是暗潮涌动。虽说是普通小兵，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一次，我在楼梯道的窗口很无意地停下来，向外张望。结果被对方楼顶观察哨的高倍望远镜看见。他们的大喇叭马上配以宣传策反攻势，大讲了一番“革命不分先后，反戈一击有功”之类的话。我就是站在那儿不动，听听还能说些什么。对方一见不为所动，便威胁起来，而后又指名道姓地大骂（大概是找来了同班同学进行了指认）。我们班的聂同学，还在楼道拐角处的那一边，招手示意我快走。我这个人还就不信邪，我就不走了，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能骂到什么时候。对方的大喇叭一直骂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说你必须立即离开窗口。对这种腔调，我完全嗤之以鼻。我在哪儿，你管得着吗？对方实在是口燥舌干、黔驴计穷、无计可施，也就消停了。等他们没有动静了，我这才离开那窗口。鄙人的名字从没有如此有幸地在全校的上空响过，居然还响了半个小时之久，也算是难得一次的“声名大作”。

第二天，系办的翟老师还很郑重地跟我说，以后你出去，可要小心啊。以至于一年多后，大联合了，对方的同学还想起来问我，那天你在干什么呢，弄了那么大的动静？我说我没干什么，就是在窗口看光景。还真是这样。其实，我和对方组织并无过节，只是想以此告诉对方、告诉大家，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是不可能征服一切的，即使是面对一个弱者。好在人大的武斗，那时还没用枪，不然那次真能完完。当然，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就不会

在窗口看光景了，除非是第一枪就朝着我来。

几天之后，我才知道，我遇到的可不是一般的“玩笑”。原来此时双方都已配备上了杀伤性武器——强力弹弓。那东西，原理是和小孩打鸟的弹弓是一样的，装在大楼的顶上，打上两个固定的桩，或是双人床的床架子。只是连接两端的，不是猴皮筋，而是金属的弹簧圈或是自行车的内胎。力道可大啦，拉开后可以将砖头石块打出去百米左右。得用几个人拉。松手时，几个人齐声喊“一、二、三”，大家同时赶紧闪开，不然就会把人带出去摔到楼底下。那时，双方总部大楼顶上都已经有了那玩艺。那天，他们对方楼顶上的几个还真商量过：对面窗口上戴眼镜的那个“三红”的小子，几次三番不听警告，要不给他点眼色，来一下子。可能是考虑到那玩艺力量虽大，但准确率极差，还不知会打到哪儿。骚扰一下还可以，精准打击还不行。而且我所在的东风楼离他们的图书馆楼也太远，恐怕打不着。所以，这次我没有成为烈士，被人们抬着遗体上街去抗议对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几个月之后，形势骤紧，武斗四起，就不能这样硬撑和大意了。据说，在“三红”后来占据的红楼，因为双方距离较近，那楼顶上的弹弓就打到过“新人大”的人。被打中的那人，差一点从五楼的屋顶滚下来。

## 5. 武汉“七二〇事件”

1967年7月，到了该是毕业离校的时候了。应该去年这个时候就该走的61级学长都还没走呢。低年级的同学们说是要“复课闹革命”。不对吧？能复得起来么？没一个星期，这复课的事就黄了。我们的毕业，连说也没人说。不但毕业没有说法，那一阵事儿还是不少，大型活动一个接着一个，这几分二节讲二件事。

一件是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北京。这是因为在前几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〇事件。湖武汉在进入1967年之后，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日趋激烈。一派是所谓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一派是所谓的造反组织“工总司”。

如前所述，这儿的造反与保守，都没有褒贬之意。而在武汉地区支左的部队，对地方上的两派争斗介入较深，而且还是明显倾向于“百万雄师”，压制“工总司”，引起了中央文革的不满。为了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一些中央要员，如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郑维三、李作鹏、余立金、王力等，在这年七月都到了武汉。

其间，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指示要给“工总司”平反，还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可以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此话请见：卜伟华 2007 年 9 月在香港科技大学所作“‘文革’与红卫兵”的讲座）7 月 18 日，周恩来根据毛的意见，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方针：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把“工总司”打成反动组织，镇压那么多工人，是不对的，应当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等。会议上还说了，这些意见暂不向下传达，怕有些群众接受不了。但是军区政委钟汉华却让独立师把这些内容传给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就群情激昂，压不住了。

然而，那个王力却想抢头功、出风头，会后深夜，和谢富治一起跑到“工总司”总部，表态支持，还戴上了他们的袖章，并透露了一些风声，斥责“百万雄师”为保皇派。这一下更惹怒了“百万雄师”，本来就想出气找不到发泄的地方，这下来劲了。“百万雄师”又出于策略的考虑，觉得谢可能不好啃，就集中力量盯上了王力。

7 月 20 日上午，“百万雄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的数百人带着武器，冲进王力所住的东湖宾馆“百花二号楼”，把他抓走，还动了手，打得他腿骨骨折。哪知毛泽东当时就住在这个宾馆的另一个院子“梅岭一号楼”，受了惊动。刚回北京的周恩来，闻讯立即派出飞机，当天就急急忙忙把毛泽东转移到上海。使毛泽东原本想再次横渡长江，借此掀起文化大革命又一个新高潮的打算落空。这是毛泽东极少有的几次坐飞机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而且，上飞机的样子很仓忙，这儿就不说了。这下，“百万雄师”及支左部队就此闯下大祸。这就是武汉七二〇事件。（详见：丁晓禾《狂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

极左势力正好拿此大做文章，说当时的武汉驻军是武装叛乱，是要谋害毛主席，试图趁机拱倒他们一直想拱而拱不动的军队当权派，从而把他们的势力伸进军队。中央军委发

出通知后，“百万雄师”也只得马上放人。7月22日，谢富治和还绑着纱布的王力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中央文革”组织的英雄般的欢迎。

北京的各群众组织，这下都像打了鸡血针似地兴奋了起来。7月21日下午，“三红”就上街游行了，并有几百人到永定门车站捕捉想要来京游行上访的所谓“百匪”。连同其它院校的，有数千人，冒着倾盆大雨，在列车来后，封锁车门，逐个车厢搜查，抓了不少。次日上午，又去西郊玉泉山宾馆抓陈再道（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甚至冲破几道岗哨，每个楼都搜了个遍，结果是一无所获（其实陈是23日到的北京）。这些，都不会有我什么事。现在想来，这些事不去还真少了些写回忆的材料。不过，去的人也就不想写这些了。

接着，7月25日下午，就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欢迎他们两人凯旋和声讨陈再道罪行大会。大会所呼的口号，对我来说，没有更多的兴趣。感兴趣的是，这回我们上了西面的红观礼台。要是在国庆那天，这可是知名人士、全国劳模才能上的啊。这种大会，恐怕也没有什么知名人士、全国劳模会来，而观礼台也不能空着，所以我们就有机会上去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上观礼台。站在观礼台上，向前望去，果然整个广场、东西长安街气势非凡，整个场面更加开阔壮观，令人振奋。眼睛所及之处，红旗翻卷，人潮如海。那人群不能用黑压压一片来描述，因为都是穿着黄绿色军装，在红旗的映照下，真的是红的海洋、绿的海洋。上百万的红卫兵，个个都是激情万分，竭力地呼喊“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竭力地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很多人脸上泪水和汗水流在一起。这可是真的到了“誓死保卫”的时候，纯真的年轻人能不激动吗？诺大的天穹之下，满是万岁万岁万万岁那震耳不息的声浪。只有在这时，才真的是表现出“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吃饱了饭，不读书，不做工，不种田，天天来这样闹革命，只要不打到自己头上，能不是节日吗？

置身在那狂潮般的革命浪涛中，似乎不由人热血沸腾、忘乎所以，真的要想跳下去，尽情地融化到革命的浪潮之中（写到这儿，居然还猛地一下想起了日本电影《追捕》里的台词“跳下去吧，跳下去吧”）。回头看那天安门城楼，在阳光下金碧辉煌、红光四射，那么庄严，那么神圣，似乎在散发着无比的魅力，吸引着多少人为此心驰神往、无际遐想。

那天毛泽东没在上面（还在上海），也叫我足足端详了好长的时间。我特地挤到观礼台东北角的最上一阶，看见上面的那些人物也在那指指点点，情绪也挺兴奋热烈。

这是林彪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毛泽东没有在场的情况下，站在了天安门城楼的中央。以往每次与毛泽东一起出席重大活动，他是早到也不好，晚到就更不行，只能早到一、二分钟，非常地难办。据说，林彪由此并不喜欢参加这些活动。然而此时，正是“中央文革”的势头达到了顶峰，可以直接与军队高层相撞，这是林彪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这次大会本来并没有叫他来，没料想他一反常态自己主动要过来。我远远看见他在城楼的中间，一改过去那种谨小慎微的样子，难得的神情开朗、手臂舒展。不过就林彪这么点小小的表现，马上就有他身边的人报告毛泽东了。

现在有人想为林彪翻案，说是“913”逃亡事件是因为他被毛泽东逼得无路可走，不得已而为之。这种说法，显然不全面。毛泽东在文革中有重大错误，但不能因此而减轻林彪的罪名。林彪为极左势力效尽犬马之劳，是主动的、积极的，对文革这场大灾难负有重要责任。最后，只不过是当走狗没当好，想投机不料却落得个摔了飞机。他的死，不值得同情。但林彪倒是有他的个人特点。前面讲过毛泽东打击对手的三个基本手法，第三个就是要被整的人反复作自我检查，尤其是要留下书面检查，自己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这样就可以留下永远的把柄，而林彪可以说是唯一不肯检查、也没有留下书面检查的人。

这儿先不说林彪上天安门，还是讲王力。王力的事，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就发生了出人意料的180度的剧变。话说那个王力一时间头脑膨胀、得意忘形，伙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喊出要“打倒军内一小撮”，结果引起了军内高层（包括林彪系和非林彪系）的强烈不满和不安。这可是触动政权基石的严重问题啊。接着，他又发表所谓“八七讲话”，煽动外交部的造反派夺取，影响到周恩来的职权。不久就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在权衡利弊之后，无产阶级司令部很快作出了反应，在枪杆子和笔杆子之间作出了选择。8月26日，王力才兴旺了一个月，就在钓鱼台的会议上当场被隔离审查（次年1月入狱，直至1982年获释）。



武汉事件的有些问题，至今尚未完全清晰。简单讲，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已经演变成几股势力的角逐，即便是在高层也是如此。而且是军队与地方、高层与底层、当权派与群众组织以及各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许多不同利益和矛盾纠集在一起，形成了极其复杂尖锐、你死我活的搏杀。而且号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有失策之处，极左派在心烦意乱、疑神疑鬼中自乱阵脚。

文革至此，已不是一年前王洪文在极左势力的支持下对围困在上海柴油机厂的对立面的大打出手，也不再是走资派被一个个地打倒，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损兵折将——随同王力倒台的还有关锋、戚本禹。王、关、戚的垮台，意味着中央文革走向下坡，江青不可能再成大器。这之后，损失的几乎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原本不多的人。极左阵营内部林彪系和江青系的人，也从相互支持配合演变成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了（比如，陈伯达因为江青欺人太甚而倒向林彪）。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还是烈火旺盛，但内里已然是一股虚火。不同势力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已经烧向了军队，燃烧到了军队内部的高层。这之后的杨余傅事件、林彪事件，直至“四人帮”被轻易铲除，都是和这些有关联的。

## 6. 揪刘火线

这期间，还有次比较大的一次活动，是8月3日随“三红”的大队伍去府右街的中南海西门的“揪刘火线”走了一圈。

“揪刘火线”，是当时全北京几百上千个群众组织，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从7月13日开始，以围困中南海的方式要挟中央交出刘少奇任由群众批斗。7月17日，又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了有几十万人的“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向刘少奇发出“滚出中南海”的最后通牒，否则就要采取“最强硬的革命行动”。这之后，整条府右街更是红旗如海，吼声如潮，搭满了各式各样的棚子、台子，各单位的造反派都来占据一席之地，争相在此表明革命态度。还有人统计了个数字，整个府右街搭上了7000多个棚子、插上了3000多面旗子、安

上了500多个高音喇叭（具体数字引自：《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那些天是没白没夜的游行不断、集会不断、大喇叭里骂声不断，真像个超大型的政治展销会。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对国家主席随意叫骂，真像成了国家的“主人”，以至于有的人至今对文化大革命还念念不忘。我们在那儿转了一圈，看看就走了。那个噪音啊，实在受不了。你想想，几百个高音喇叭在不停地狂吼，各种各样的男尖音、女尖音在狂吼，而且是各吼各的，也听不清到底在吼什么，人在里面是个什么滋味啊。我望着中南海那神圣而又神秘的大门，如今竟然成了可以竞相叫骂的场所。国家的尊严何在？民族的尊严何在？党的尊严何在？无言以对，转身而去。我真的走进中南海的大门，走进丰泽园，已是二十年后的八十年代了。

后来知道，就在这8月3日的晚上，北大的聂元梓一伙商量准备在8月5日分两路人马出动。一路去找周恩来，试图压服他答应让群众批斗刘少奇。一路直接冲击中南海，大闹一场，揪出刘少奇。后因极左势力没敢表态而未能得逞。

尽管“揪刘火线”最终未能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批斗，8月10日，围困群众基本撤离府右街。但是到了9月13日，刘少奇的子女被赶出中南海，王光美被捕。刘少奇被连夜筑起的一堵高墙围住，从此再没见过自己的亲人，直至两年后的1969年11月孤独地凄惨地全身赤裸头发盈尺挂着“烈性传染病”的牌子死在河南开封秘密监狱。就算他有缺点，就算他有错误，就算个人之间有矛盾、有恩怨，何止于非要搞到家破人亡还不肯罢休的地步。

这期间还有不少大型批斗会，或在工人体育场、或在哪个高校。如：1967年3月2日在工体批斗谭震林、4月10日在清华批斗王光美、4月27日在北大批斗彭真、6月26日在工体批斗罗瑞卿、7月24日在矿院批斗陶铸、8月21日在工体批斗彭德怀等。8月26日，还在人大校内，由“新人大”联合校外的几个单位联合批斗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聂真（原人大副校长，聂元梓的哥哥）。所有这些，以及包括批斗校内当权派的大会，我一次也没去，或不在校，或不想去。我不想凑这个热闹，不想借此表现自己，更不想趁机发泄内心里某种阴暗的东西。我的心里没有那种东西。■

【述往】

##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四）

宋翔雁

### 一、精心设计，俯首就擒

我内心的抵抗意志经历了十余天连续的侵蚀后，赵某于二月下旬某日终于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不再等待了。她一早来到长田，就开始对我展开了决战前的最后冲击。她进屋后先让我坐下，自己也坐在我的对面，仍用此前同样平和的语气说道：怎么样，已经十多天了，你的问题应当有个了断了吧？经历陪斗王大宾和听了刘昭明对你的揭发以来，特别是在刘昭明给你的家书劝导下，你内心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想顺应形势承认交代，又因某些具体问题而疑惑，故摇摆不定拖延至今。昨晚你爱人又写了一封信托我今天捎给你（说着她取出了信件，但拿在手里并没有给我），由此可以看出她比我们还着急，希望你赶紧承认交代，尽早回到她的身边。她放下信回家前我还跟她说道：我会把你的心情告诉他的，你就在家等他吧！她不愧为一个打攻心战的高手，上述一席话说说的都是昭明，而没有说出她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而且在诉说上述的话语时，手里还摆弄着昭明交个她的信件，两眼一直停留在我的脸上，观察着我表情的变化。面对他的目光和话语的停顿，我没有出声但却不能久视她盯人的目光而移开了自己的视线。这时，我听她继续说道：今天，我想给你一个方案供你考虑。如果今天你能识时务面对现实，也珍惜刘昭明对你的劝导，就承认自己参加过地院“五一六”组织，是一名“五一六”分子。那么，组织上将决定今晚就让你回家与家人团聚，并在家里继续完成你对个别记不清的问题再作思考，并完成最终交代材料的编写。我刚刚提到的方案，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军宣队领导研究后慎重作出的决定，是出于对你和你家庭关心的体现，希望你能很好地考虑考虑。当然，你也可以不考虑我提的方案，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但我确信，其他任何方案只能给你和你的家庭带来更大的伤害，而非相反。她说完这一席话后就停了下来，她也没有再次催我给予回答，似乎她决心等待一

段时间，似乎她有那个自信知道我会怎样回答一样，时间就在这种等待中一秒一秒地过去。这时的我实际上已经没有继续坚守自己理念的信心和勇气了，事已成定局再无回天之力了。应当说，为了孩子今后的前途，我所追求的确保自己政治上的清白的目标，到此时已经被自己的情感之重所吞噬而不复存在了。之所以一时还张不开嘴违心就范承认，不是因为我还在想什么，还在考虑怎么说，而是因为我的脑子已经空空如也，再也“开动”不起来了。就这样僵持了至少有五六分钟，赵始终未再发一言，看着并等带我说话。经过这五六分钟的长考后，我向赵璧媛说道：我接受你提出的方案，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这一事实。容我再回忆思考后，完成上交材料的编写。说这番话时，我没有正面看着赵的面部，我不清楚当时自己的复杂心情，作为一名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是羞于还是不愿看到胜利者的面部表情？！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后，赵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并说道：欢迎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爱人的信我现在交给你，你可以回家后再看。现在我代表批清运动领导小组对你宣布：宋翔雁隔离审查学习班今晚正式结束，待送你回家后继续完成遗留问题的交代和最终交代材料的编写。在材料上交和大会正式宣布结束隔离审查之前，不得在外随意与他人交谈有关运动事宜，有需要时应通过家人找领导小组反映、解决。说完这席话后，赵问我听明白没有，能不能做到。对此我给予肯定的回答后，她又说道：现在你可以开始清理一下自己的东西，傍晚时分有专案组人员送你回家，我回去会先通知刘昭明的，以兑现我的诺言。在此我想补充一句，当赵听完我接受他的方案后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再也没有了此前那种关心、理解、温存的语气和语调了，又恢复了她那一贯的对人训导、说一不二的政工干部所习惯的语言和语调了。这恐怕也是在政治运动中，每个政工干部都需要的多重面孔吧！

赵走后专案组将原收走的个人物品悉数交还给我，并让我抓紧整理好个人物品，并清扫住房。当一切收拾停当，专案组看过并认可后，我坐在行李上，打开了昭明请赵带给我的信件。信中所写的仍然是让我当机立断，不可再犹疑不决而错失良机的多次提到过的话。但此信中有一段话（大意）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至今难已忘怀。即，你必须看清对

被立案审查的“五一六”分子而言，交代与否其前景有天地两重天的差异。你既非党员又非干部，而且出身不好，无须在意因“五一六”问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多大影响，而且党的政策是说得很清楚的，切不可庸人自扰，加重自己的思想负担。我思考着、辨析着这段话的哲理，觉得爱妻的这一看法可谓入木三分极为深刻。这对我能放下“确保自己政治上的清白”这一沉重包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我也懂得，尽管眼下天天在讲有成分，但不惟成分，重在表现。但碰到具体问题，从来都强调要从阶级分析入手。若犯错误了，出身好的统统说成是认识问题，而出身不好的，一般则成了立场问题。而在作这种分析和判断时，个人政治上的清白与否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这一现实从我个人经历过的历次运动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我们直到天色傍黑才将个人用品装上两轮排子车，在专案组成员陪同下，由我拉着车子朝龙陂家中走去。尽管此行是回家，但我的心情却少有回家的欣喜和激情。脑子里想的不仅是文革以来，特别是一年多来的苦难历程，更多的则是，如何才能及时而又恰如其分地写好个人的交待材料，把违心承认的谎言说圆。“重任”在身大约也是自己兴奋不起来的原因之一吧！

## 二、终于相聚，彻夜诉谈

到家门，专案组的人帮我把东西卸下车并嘱咐我记住赵上午交代过的事项，在他们将车拉走后，我和昭明随即将物品先搬入棚子内放下，然后进入屋内。我看到儿子正坐在床头瞪着眼睛看着从屋门进来的我，不知他是害怕还是奇怪，一个劲地向床里面蹭，既不叫妈，更不叫我。直到昭明抱起他来，让他喊我爸时，他才怯生生地喊了声爸，我答应着他想去抱他，但他躲着不让，我只好作罢。昭明说你别急，他认生得有个过程，孩子的这一状况，也让我想起了一年多前在樟树车站接他们母子时的情景。当昭明放下孩子后，我立即将她拉到身旁并低声问她：我于67年初夏在新街口豁口和你谈论文革的事是否还记得

（因此事让我一直放心不下）？当她表示一点也记不起时，我就以没关系让她不用再去想了，从而也使我心中的一份隐患得以永远化解。当我的一块心病被排除后，回家的感觉方有一点点升温。在和儿子戏耍一段时间后，他也逐渐与我熟识了一些，父子情深之感油然而生，我看着他脸蛋上仍隐约可见的伤疤，又勾起了许多过往的回忆。这时，忙碌的昭明让我放下孩子，说孩子要睡觉了，别让他疯得太厉害。于是我放下了儿子，他妈给他换了衣服、让他撒完尿后，就陪她先睡下了，我则回到棚子里收拾我带回的东西。

当东西基本整好我正在观看昭明搭建好的棚子时，她出来唤我回去赶紧休息了。但我毫无睡意，肚子里有很多话想和她说，为了不被他人听见，我们躲在被窝里“窃窃私语”。当我说道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采用说谎的方式过关，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做法，可能以后会因此而付出代价时，她有些委屈，误以为我是在责怪她。并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害了你？我搂着她并解释道：我说的话，包括我自己在内。而且，我还把我对她信件中我认为入木三分的看法告诉她，觉得自己确实无必要再坚持，而是要永远记住远离政治的原则，经过这次整饬之后，我已再无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想法了。俗话说得好凭本事吃饭，做好本职工作，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我深信，凭你我的学识和能力，不必担心有无容身之地之危，也无需害怕有无用武之地之险。我担心的只有一点，即在外界环境较差的境遇下，如何教育孩子成为一个爱科学有知识的人。否则，一旦孩子今后学无所成又一无所长时，那时我们将会有一种负罪感而自责不已的！此外，我还把心里想的一股脑都说出来了。我继续说道：眼下说谎过关只是应景而为的无奈之举，切不可自己背包袱说什么害了我的话。正好相反，我觉得这次是我害了你。你想，如果你不嫁给我，你一个逍遥派是不可能摊上今天这份罪的，你说对不？！我这一席出自肺腑的心里话，让她释然也让她知道了我对她的真心付出是珍惜有加的。在连续无日无夜的操劳后，她累过头了，终于在我的怀里含笑似地睡着了，而我，守在妻儿身边，想着这一年多来的一切，想着明天开始还要面对的“艰难”任务，想着今后国家、学校可能的未来，想着自己及家庭今后的去从，我却毫无睡意，辗转反复似乎已近天明时分才慢慢地睡去。

### 三、妻子的回忆：我是怎么降服这头犟牛的

当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后，翔雁在两名专案人员的陪同下才回到家中。不知怎地，分别一年多后的相见，彼此都相当拘谨，这也许是各有心事的缘故吧。翔雁走到床边先把儿子抱起来，孩子还有点认生的挣扎着，我赶紧过去对儿子说：快叫爸呀，小牛！儿子盯着翔雁的脸，怯生生地喊了声爸，这一下就把翔雁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我看他脸上泛起了满意的笑容，亲了一下儿子的脸蛋，但儿子还是明显不肯接受突然来到的他，使劲向我身上倾斜，我只好把儿子从他爸爸手中接过来，并一个劲的说：你不是老说你想爸爸了吗？怎么不肯让爸爸抱呢？儿子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却回过头来看了看他爸爸。确实一年多了，孩子的记忆里，爸爸的形象早就没有了。我怕翔雁心里难过，赶忙对翔雁说道：已经一年多了，尽管他嘴里总念叨着爸爸长爸爸短的，但你的样子他肯定记不得了，所以又生疏起来，别急过几天就会好的。说着我顺手将孩子放在床上，让他自己去玩。并转过身来问翔雁要不要吃些东西，而且告诉他我也没吃呢。这时我才觉得翔雁使劲地看着我，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轻声地问道：你还记得六七年夏初，我们回家在豁口附近相遇时，聊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事吗？他的问题很突然，加之我根本没往这方面想过，我就说道：我不记得咱们聊过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事，怎么了？他嫌我说话的声音较大，还用右手食指贴在自己的嘴唇上，让我小声点。我知道他是怕周围邻居听见而作的手势，就点了点头。接着他说道：没什么，赵璧媛让我再想想六七年六七月的情况，所以问问你，你不记得就算了，不用再费力去想了。然后他说道：那我陪你再吃点东西吧，何必要等我呢？你肯定饿过头了。

吃饭时我感到翔雁并没有多大胃口，吃得很少，也许是回来前吃过了吧。但他却目不暇接地一会儿看看儿子，一会看看我，有时还会因看着儿子的动作好玩，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吃饭过程中，我一直注意着他的表情和话语，我觉得他的话语明显减少了许多，脸上多少有些木讷的感觉，这又让我担心起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让我内心隐隐地作痛。

所以，为迎接翔雁归来的这顿晚饭，对我来说也形同嚼蜡一般，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

饭后我很快安排儿子睡下，并躺下来和平时一样哄他入睡。翔雁则在屋里整理他带回的东西，需要洗换的都挑出来放到棚子里，我感到他在棚子里呆了很久，我担心他冷喊他快些进屋不要冻着，但怕吵着孩子，又不敢大声喊叫，估计他没有听见，我只好先不管孩子，起来去棚子里把他叫进来。这时才发现他正在仔细地观看着他因审查而没能建好的棚子呢。顿时我的泪水就流下来了，为了不让他发现，我赶紧擦掉了流出的泪水，心里又油然而生了一股暖意，心想他确实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丈夫和父亲，我拉着他的手，劝他赶快进屋别受凉，因当时气温还是很低的，尤其是夜间，很容易感冒。进屋后见孩子还没睡着，我又躺下去哄他，并嘱咐翔雁不要再出去了。

等孩子睡着后，我起来帮他收拾好的东西，分类摆放在我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地方后，屋内立马就显得整齐多了，看起来也让人感到舒服了。这时我们彼此目视了许久，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但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大约彼此都在考虑该说什么，该从哪里说起好呢。最后还是我先开口说道：咱们还是先洗洗后，上床再说好吗？他点了点头，同意了我的建议。

上床后，我们彼此几乎同时指了指左右和前面的房子，大家都明白，这里不隔音，尤其在夜深人静之时，说什么别人都能听见。但我们各有一肚子话要说，憋也憋不住。想了想，我们把被子捂住头，躲在被窝里开始了彻夜的长谈。首先是他问我为什么要编造谎言说自己是“五一六”，难道军宣队他们能信吗？听后我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问题所在，即他至今还相信军宣队是认认真真的在抓“五一六”呢！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道：你真的相信地院有这么多“五一六”吗？他肯定地摇摇头说不信。这时我才慢慢对他解释道：现在整个形势就是这样，只要有人揭发说你是“五一六”，那军宣队就认定你一定是“五一六”，千方百计也要让你承认，一旦承认后，就不再过问了。否则就老关着你、折磨你，直到你熬不过了最终承认为止。到现在为止，革委会从上到下的干部都成了“五一六”，几乎无一例外。红教联的头头和造反派老师也都是，他们交代后就没事了，你一个



小老百姓还顶在那干嘛？对我的这一席话，他听后沉默了很久，然后问道：你难道觉得我欺骗了你，我是“五一六”吗？听到他如此发问，我更加理解了他心中的症结所在，我立即把他搂在我的怀中，在他耳边亲切地说道：我一直都相信你的正直，相信你绝不会是“五一六”分子，更不信你会欺骗我。但我不能让你再傻乎乎地瞎坚持，那样做真的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你看看那么多的党员和干部，谁像你一样犯傻？这时，我只觉得他把我搂得很紧，但对我所说的话，却没有做出任何回答。我知道他还在想着我所说的话，我不想打扰他的思绪，确实需要给他时间，让他自己想通才行。否则，下一步他如何交代都会成了问题。我不想，也不能打扰他的思考，我只能顺从地依偎在他的怀里，尽管我都觉得有点喘不上气来了。这是一种令人焦灼、难耐的等待，但最终他终于松开了紧紧搂着我的胳膊，让我得以大大地喘了口气，只听他低声对我说道：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但你想过没有，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眼下尽管可以让我过关，但今后就不会受到惩罚吗？！面对他的这一看法，我无言以对，但却感到我的心被深深地刺了一下。所以很快也回了一句：难道这么多党员干部都是机会主义，就你这个大白点是马列主义啦！他表现的非常敏感，听出了我那带刺儿的话，立即抚摸着我说：我不是说你，而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已经说了，眼下只能这样走下去了，但今后又会怎样，总得有个考虑吧。至于说到那么多党员干部，我们不要和他们比，我们自己也没有那份本钱。在学习班里我早就想好了，今后不管干什么都行，我们绝不会落在别人后边，但涉及政治上的事，离开它越远越好。你看，如果不是因为我，你这个逍遥派当的该多笃定呀！说着不仅把我引笑了，他自己也笑了起来。为了让我安心，最后他再次强调，今后就按你的想法尽快帮我过关吧！至此，我那高悬的心总算落到肚子里了，我心想，这头犟牛终于被我驯服了！想到此，我会心地偷偷乐了很久。虽很快就将进入梦乡，但我还在为自己的抉择庆幸着，我觉得这一年多的经历，更让我感受到他人品和责任心的可贵，感到他是我终生可以完全信任的人。为此，这一年多的苦难付出也是值得的，所谓日久见人心也不过就是如此吧！

#### 四、以谎言换回“自由”

清晨起床后，我即告知昭明，请她尽速帮我打听清楚加入“五一六”的表格是啥样的？一般什么样的人才可能作介绍人？其他方面的事不用她再操心，我自己是有办法拿捏的。同时我也问她心中是否已有向她提供这方面情况的对象，并嘱咐她找人时要特别小心，不要被别人发现。此外也要注意是否有人盯梢，因为那些整人的主很可能正瞪着眼睛观察你的动向呢，万万不可大意！当昭明带孩子去幼儿园和上班后，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房间，给自己安排好一个书写材料的位置，随即就静下心来思考材料编写中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

经苦思冥想后思绪渐清，在昭明回来前我终于理出了编写时应注意的几个方面，即1、在大的骨架上（时间、地点、个人状况等）坚持过往历次材料中的真实回顾，让编造的部分嫁接其上。即以真实的东西做基础，自然而有分寸的加一些需用的谎言；2、基于历史真实，绝不编造任何反总理、反中央（或有可能被引申为反总理、反中央）的想法、议论、会议或行动，即绝不在罪行上编造谎言；3、所有编造的谎言，尽可能采用模糊的叙述手法或说法。因模糊既便于谎言被戳穿时易于回还；又可避免直接对他人造成伤害；4、要有自信，坚信我占有时间节点上的巨大优势（即我67年9月中旬即退出简报组、9月底即患病全休），故没有多大可能参与“五一六”的具体活动。而在这点上，军宣队和领导小组也是心知肚明的，只要我材料上确认自己参加过“五一六”组织、是一名“五一六”分子，那就给了他们“一打一个准”光荣下台的台阶，从而不会再在其他方面与我纠缠了。

请看我妻昭明第二天为我做了什么——

次日一早我将孩子送去幼儿园后，回来告诉他不要外出，好好在家里写材料，赵璧媛事前是打过招呼的。他告诉我回来前专案组也向他打过招呼，并说道：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帮我把加入“五一六”填写的表格搞清楚，我现在卡壳儿就卡在这里，瞎编出了问题就不好办了！至于介绍人的问题，我还可以再考虑，其他方面如何应对我心里基本有数，你可

以放心。

因我还得上班（即在菜班劳动），不可能到处去找人了解情况，而且我熟悉又能相互交底的人也有限，岂能随便就向他人询问加入“五一六”的表格是啥样的问题呢。想来想去我觉得只能去找五连钻探教研室的唐振权老师打听，因我们与他的私人关系还不错，而且他也比较乐于助人。文革时他是地院《东方红报》的编辑之一，清查“五一六”开始不久就被办学习班，但旋即他就坦白承认了，所以基本上没有受多大的罪。下班后，我先接了孩子，想以找五连何谓平同志（他原是钻探实验室的实验员，现在干校开拖拉机。在翔雁被关押期间，有事找他时都能尽力相帮）给孩子理发为由，去五连集体宿舍找唐（唐是单身来干校的，故住在集体宿舍）。但直到小何（我们习惯这样称呼他）给孩子理完发，也未见唐老师回来。因此我只好轻声对小何说道：请转告老唐，我有点事要找他，若可能，七点左右我去锅炉那打水，在那见面。听后，小何也低声答应道：没问题。

回家后，翔雁立即问我打听到了吗？我将情况告知，说七点钟打水时看看能否见到唐老师，届时我会向他打听的。翔雁也觉得这样好，说他知道的情况较多，也许能帮上忙。打水时，如约见到老唐。但因打水的人太多，谈话不便，加之天色已晚，找别的地方再谈又觉不妥。所以，我约他次日下班后在菜班库房后的树林里等他，因他为人大大咧咧，故我未直说，只让他千万别忘了。第二天，我请了会儿假提前将孩子接出来并送回家里，再返回菜班库房后的林地。唐老师见到我后说：什么事搞得神神秘秘的？我才把翔雁现已回到家中，正为交待加入“五一六”填的什么表着急呢，想问问你那表是啥样子的。听后唐说道：我也是听说的。表有两种，一种是好纸铅印的，另一种是普通纸油印的。表头印的是“五一六”兵团登记表，内容除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日、籍贯、工作单位、政治面目、家庭出身、职务、参加过那些造反组织、推荐人（也有说是介绍人）、推荐日期（或介绍日期）、批准人、批准日期。他还告诉我，表格的栏目填多填少没关系，介绍和推荐写哪个都行，让老宋别太较真，军宣队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些小事。听说干校这边交代的表格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都是自个儿编出来的。当我说到介绍人或推荐人翔雁不知填谁为好，

既怕拖累了人家，又担心说他瞎编。唐又说道：嗨，填谁都行，但需是老造反派，只要那时和他交往较多的就行。即使说贾振远或陆炎德介绍也没关系，对他们来说多介绍一个或少介绍一个都没事的。老宋就是自己想不开，早承认了多好！唐老师的性格如此，拿什么都不当回事，成天乐呵呵的跟没事人一样。但毕竟他是“过来人”，所以我认为他的这套处事“理论”，对眼下帮翔雁走出困境应当是有效的（尽管我知道，翔雁对唐老师的这套处事哲理是有极大保留的）。这大约也是急病乱投医的一种表现，恐怕又要被翔雁说成是机会主义了。但我管不了那么多，只要能尽快让翔雁解脱就行。所以我谢过唐老师后，又告戒他还是小心点好，让他绕点路回宿舍，免得引人怀疑。

到家后，我立即将老唐所言如实告知了翔雁，但有意略去了老唐对他的评价。说完我问道：你觉得唐老师说的行吗？对我的问话他感叹地说道：看来这世道真的变了，对人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对事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简直实用到家了，逼得被整的人用机会主义的手段，对付整人的人功利主义的态度。听后我的心就完全放下来了，我心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面对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态势，换一种能够保全自己的方式，是不应当都被斥责为机会主义的。看来我的老公正直有余，灵活则欠缺呀！故又说道：你总算看明白了，我还怕你会批评人家老唐的一片好心呢！

至此，他写材料的事我就不再操心了，相信他定能顺利过关的。因为心境不同了，这时我才注意到，不仅他人体很瘦，而且时不时的表情有些发呆，夜间睡觉时，他有时会起来搓脚，而且左足冰凉。我问他后，他说学习班里大夫给他看过，说左足气血不畅所致。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呀。他的身体状况又突然令我担心起来，我知道这将是我下一步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我必须千方百计为确保他身体和精神的健康作出努力。因为今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某种角度讲，我们这个家的新生活才刚刚要起步，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不仅是新生活顺利起步的基础，更是新生活全面展开并结出硕果的保证。但我知道这一切需待他上交的材料得到认可，并正式宣布解除隔离审查时再做具体安排了。如今，我正急切的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昭明回来后告知我准备找唐振权老师打听表格和介绍人的事情，已托小何转告他七点在锅炉房打水哪儿等他。对此，我也觉得可以。但唐老师有大大咧咧漫不经心的毛病，我嘱她少说我的情况，多打听些他是怎样交代的，尤其是表格式样和介绍人的资格，也可再问问加入时有哪些手续，多知道些有备无患嘛。

经过昭明数次与唐老师的交谈，我终于知道了表格的样式和介绍人只需是老造反派即可，而且也知道了唐本人也是编造后才得以脱身的事实。从而也说明他所说的格式也未见得是真的，也说明我原本认定的运动扩大化确实是存在的。但也就在此时，我才自省地看到自身思维模式上过于机械的弱点，既要编造谎言，区区一点小事（表格式样、介绍人等）竟然也会成为我难于解决的难题！难怪惯于用谎言忽悠群众的赵璧媛之流能设计出“两步走”的方案，鼓励我先承认，后圆谎的解困办法。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类似我这类思想方法过于机械而不善于审时度势的人，是不能介入政治的。

有了唐老师告知的情况，我很顺利的就写完了个人的揭发交代材料。因为大的骨架未变，这些材料我已经不知道写过多少遍了，只是需要在谎言部分的编排和嫁接上多做了些考虑罢了，并无太大难度。现在能记得的梗概是：大约八月底或九月初，核心组某人（记不清姓名了，因当时我与总部里的一些小将接触少，对他们的名字不熟悉，更别谈记了）在作战部办公室召集作战、动态、简报组的成员（三个组的办公室均在学九楼四层西侧）开会，会上召集人说：现在全院的人几乎都参加了《东方红公社》，所以组织有些庞大涣散，大家反映过多次，有时有事连人也找不到。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所以总部研究后决定，把早期的老造反派集中起来，成立一个““五一六”兵团”，作为《东方红公社》的核心。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说这件事的，希望大家珍惜老造反派的荣誉，严格要求自己。表格我已经交给金希华老师了，会后每人领一张，填好后再交还给金老师即可。表内介绍人一栏，你们愿意的话填我就行，不愿意的找其他核心组成员介绍也行。为了避免公社内部人员误解，说东方红内部分三六九等，希望大家不要随便对外说我是东方红核心组织““五一六”兵团”

的成员。

我记得所填写的表格上印有““五一六”兵团”登记表字样，表内栏目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日、家庭出生、政治面目、何时加入东方红公社、现在的工作部门、所在班级或单位、介绍人姓名、审批人姓名、填表时间等。我领了表后，还问了金希华老师主持会议的人叫什么名字，怎么写法，然后才回到简报组填写的，填完后就立即去对门作战部办公室，将表格交给了金老师。

我觉得选择上述方式编造的谎言有以下三点好处：1、在作战组办公室“开会”，由总部的人来讲一些京内外东方红小将们的活动情况，这在当时（67年4月至9月）是极其普通也是很经常的事，故假假真真不易识破；2、采用集体加入的方式可免除对细节的追究，有利于模糊化处理，而且达到了尽量不涉及具体的人目的，免得无意中对他人造成伤害；3、时间点选在“五一六”兵团出现一个月之后和我离开学九楼患病全休之前半个月左右，既比较符合兵团从初建到发展需要时间的规律，又可为自己未具体卷入“五一六”的犯罪活动埋下伏笔。

材料写好后，我不仅十分认真地进行了反复推敲，同时也与昭明讨论过几次，觉得如此编排也与昭明此前的揭发交代吻合，于是我们决定就这样定稿了。当我将交代材料誉清后，大约在72年3月初将其上交给赵璧媛。赵接了材料后对我说道：你回去后可以自己先休整一下，想想是否还有补充的，若有还来得及添加。我们看过后，若有问题也还会再找你询问和查对。但我回家后直到大会召开前，赵从未就我所交的材料再找过我，可见让我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好让他们尽快收场下台是真，什么进一步再想清具体问题的说道，只不过是让我把谎言编圆的幌子而已，但我自个儿反倒叫起真来了！

大约三月上旬，干校召开全校大会的前一天，赵璧媛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谈话，告知我材料看过了基本上可以。并说，因你的问题已不能再拖了，军宣队研究后决定明天就召开全校大会，让你上台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你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说清自己的问题，特别是要讲清楚为何要拖这么长的时间才承认交代的原因。要看到尽管你的罪行较之有些

人为小，但你中毒却远较他人为深。如果不是组织上的耐心等待和帮助，不是大环境给你带来的压力，单靠你自己恐怕很难自拔了。你要看清这些，讲出自己的感受。边听我边想，赵的这番话不仅是让我在说谎骗人的同时，还要把一年多来对我的残酷迫害，进一步编造成是对我的耐心等待和挽救的美好谎言，甚至还要对此表示出感激涕零的心情。作为一出骗剧的设计和编导，赵璧媛的所言可谓登峰造极了。但作为该骗剧唯一男主角的我，就如任何一部剧作中的演员一样，都必须按编导的要求、意愿来演绎和发挥！

在第二天的大会上，我拿着自己编写的材料，按赵某的要求讲述了自己加入过“五一六”组织的事实。但我很快就因患病全休而未卷入多少“五一六”的具体活动，故我在被隔离审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总想侥幸过关，拒不承认加入过“五一六”组织，而成为地院“五一六”分子中态度最为恶劣的一个。但党并未因此而放弃我，一年多来不断地向我交代党的政策，耐心等待我转变后能自己主动交代，避免矛盾性质的转化。而且说到动情处还声泪俱下，从某种程度讲，假戏真做还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可惜当时没有录像设施，否则录下来现在再看，也可以审视一下当时的我，已经堕落到何等不堪目睹的程度。此后每每想到为迎合赵某等为粉饰地院抓“五一六”取得重大成绩的需要，当时自己在台上的丑角表演，殊不说是是否达到了对众多听者行骗的效果，但我自己却倍觉羞愧难当。每当回首这段不堪深忆的历史时，对自身灵魂深处创伤的鞭笞，有时竟会让我感到恐惧（原来一个人的堕落竟会如此容易），不可不警惕呀！后来我也曾对昭明说过，这大约也是采用机会主义态度处事后的一种心灵上的自我惩罚吧！

至今我也难于想起当时讲完后我是怎样走下主席台的，也记不起是怎样宣布对我解除隔离审查的。这样重大的事情竟会毫无印象，这在我身上也可为是罕见的了。我反复问过自己，这难道是为了有意忘却而真的忘却了吗？！但至今也没有得到答案。尽管我无惧审视自己的灵魂，但这段不堪回首历史的结尾竟毫无记忆却是不争的事实！

自三月上旬全校大会我上台亮相并正式宣布解除对我的隔离审查后，干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似乎就正式结束了。这里我之所以称之为“似乎”，实是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军

宣队并未在全校大会上或全校干部会议上正式对该运动进行过任何总结，也没有正式宣布过干校的清查运动正式结束。如此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仅地院教工就涉及到数百人之众的政治运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真有些让人费解和生疑。因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历次运动，都讲究善始善终。有颇为隆重的开头（动员、学习文件、交待政策等）和相当正式的结尾（总结成绩、归纳经验、作出结论等）。但唯有这次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不论在干校迁址重建时期或地院迁址重建时期，都从未对全院教职工工作过只言片语的“总结”，似乎诸大的运动从未在地院发生过一般，这岂非咄咄怪事？！难道在文革发生五十周年之际，善良的人们不应问问其原因何在吗？难道在这场对广大群众进行残酷迫害中处于领导和组织实施地位的人们，不应很好反思，并对事件策划、执行过程中的史实作出揭露或说明吗？■

#### 【书 讯】

### 聂元梓新版回忆录《我在文革漩涡中》出版

本刊通讯员 续霜红

2017年10月，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推出聂元梓的新版回忆录——《我在文革漩涡中》，全书共十九章，九百多页。书前有聂元梓的长子大胖写的“出版说明”和聂元梓的“自序”《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书后有此书的“内容简介”。

此书的第十九章是文献集，收录了有关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文件。此书的附录中，还选用了13篇近年来研究北大文革的文章。

此书售价268元（港币），香港铜锣湾洛克道 乐文书店有售。



附：

## 出版说明



我母亲的《聂元梓回忆录》出版以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在探索文革的发生、发展、终结时，这本回忆录不可或缺。人们对该书提了许多宝贵意见，也不乏有人极力诋毁。面对这些反馈意见，加之初版书中确有不少错漏，我母亲从 2006 年起，就萌生了重新修订增补回忆录的想法。在她记忆力尚好的那些年，她对原书中的一些错误作了某些修订，并写了部分章节。由于年代久远，记忆力衰退，某些事件的全过程和细枝末节，未必准确了，总感到

不满意。近几年，亲历北大文革的一些关键人物，搜集、整理了大量文革资料，写出多篇令人信服的文章。从 2006 年开始修订回忆录，直至今天才基本完成。

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书将与北大文革有关的一些原始资料，集中放在全书的第十九章（文献集）。另外，在本书的附录中，列出数篇近年来研究北大文革的文章，供关心北大文革历史的仁人志士参考。

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母亲已经 96 周岁了。她虽然很希望回答读者提出的有关问题，但年事已高，这已经愈来愈来困难了。我将努力承担这一责任，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继续为本书的完善而努力。■

大胖 2017 年 2 月

邮箱：[768715889@qq.com](mailto:768715889@qq.com)

## 主要目录:

自序: 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

第一章 燕园风雨声 (1~13)

第二章 一夜之间名满天下 (14~34)

第三章 工作组时期 (35~49)

第四章 校文革成立 (50~89)

第五章 上海串联 (90~107)

第六章 夺权与分裂 (108~125)

第七章 反击二月逆流 (126~131)

第八章 “除隐患” (132~148)

第九章 动荡的夏天 (149~221)

第十章 关于大联合 (222~236)

第十一章 北京高校学习班 (237~245)

第十二章 谁是北大分裂和武斗的后台? (246~263)

第十三章 红卫兵运动的结束 (264~290)

第十四章 “九大”及九届二中全会前后 (291~303)

第十五章 清查 5.16 运动 (304~329)

第十六章 粉碎四人帮后, 我进了监狱 (330~355)

第十七章 出狱前后 (356~368)

第十八章 让历史告诉未来 (369~392)

第十九章 文献集 (393~651)

附录 (共 13 篇文章 652~959) ■

【文 摘】

## 文革初，我在北京市委当文教书记

——《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节选（上）

郭影秋<sup>1</sup>

### 在市委当了几个月的书记

1965年9月12日起，我带领中国人民大学数百名师生到北京郊区苏家坨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当时的工作十分忙碌。在我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1966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赵汉副部长突然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市委做文教工作。”由于事先无思想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调动，我竟一时无语。经过认真思考后，我非常诚恳地向赵汉表示：请转达中央有关领导，能否准予免调。主要想法和理由是：

第一，我从1965年9月来农村参加“四清”，开始担任苏家坨公社分团党委书记，后来又调任海淀区总团党委书记，许多工作都正在进行之中。当时这一地区的“四清”运动正处在总结收尾阶段，工作确有些离不开。

第二，在农村已半年多，对于北京市委的情况不了解，也很少与城市里各个机关接触，信息不灵通，而当时的形势已很是紧张，我摸不透，吃不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干部，我很难适应这样复杂的斗争形势，恐难做好将要承担的工作。

第三，更为深处的内心想法是不愿离开人民大学，不想离开教育工作岗位。长期以来，我人生的理想和追求目标就是想教书，最高理想是做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只不过是出于革命形势和党的工作需要，多年来把我推到党、政、军领导工作岗位，以至于造成“学剑不成书误了，脱胎未净神难肖”的境遇。周总理调我来人民大学工作尚不到三年，还没有一个圆满交代。再何况，我到人民大学之后，吴玉章校长对我寄予很高的期望，而我逐渐形

<sup>1</sup> 作者简介：郭影秋（1909—1985年），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云南省省长、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等职。本文标题为人大专辑的编者所加。

成的建设学校的各种设想都未及实施。我有信心在“四清”后进一步把人民大学建设好。

但是不久，我的免调请求未被接受，中央明确通知一定要调。我清楚地记得，5月18日，吴玉章吴老特地风尘仆仆地到苏家坨公社看望参加农村“四清”及开展半工半读的师生员工。我陪同吴老参加这一活动后，就于5月19日到北京市委报到。那时，已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当天找我谈话，工作职务是是市委书记处的文教书记，分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方面的工作，首当其冲是文化大革命方面的事。立即要着手进行的是接管《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要先摸清情况，清算两报在“三家村”问题上的错误，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报社领导和编委会与旧市委的关系，改组或重新建立编委会，使报纸尽快以新的姿态投入文化大革命之中。

6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正式公布李雪峰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我和高扬文、马力为书记处书记。在此之前，6月2日，李雪峰召集书记会议。正式宣布任命和各自的分工。我作为文教书记，还兼任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代表华北局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会议。与我同样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还有郑季翘（吉林省委文教书记）杨植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西北局）、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长，代表西南局）。我们这几个人都算不上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只是边缘人员，且很快都被打倒和撤职了。我在市委的工作，多半是按李雪峰、吴德的指示行事，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若即若离。随着运动的急剧发展，在人民大学校内有人贴了我的大字报之后，李雪峰曾一度想让我回人民大学，一会儿又说暂时先不回去。6月14日到18日，我曾到上海锦江饭店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大会，走前，李雪峰交代“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之职由黄志刚代理。开会回来后也没说什么理由，就只是一般成员了。在6月25日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李雪峰又说：“影秋同志不回去了。要回，在适当时候回，一开始坐失机会，现在群众已经发动，如果挖出是黑帮，就送党委处理，向工作组交底。有人借反郭来反新市委，干脆目前不回去，将来整风再作检讨。检讨送康老（指康生）时，有机会找他们说，请他们决定。”这说明，我的去留，在李雪峰那里一直犹豫不定，而

且他对我的情况心中无数，去留如何，还要请康生决定。这就使我既日夜忙于工作，心中又不踏实，如吊在半空中一样。那时上下左右的指示和联络多，工作头绪乱，又常常朝令夕改，前后不一，许多事情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要不断地请示、汇报，稍不留心，就会铸成大错，整天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时看到、听到及直接处理的许多事情，都曾使我思绪翻腾，头脑中留下深深的阴影。

我去北京市委报到的前后一两天，大概是5月18日或19日，发生了触目惊心的邓拓自杀事件。邓拓当时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他是党内著名的秀才，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等职，同时，又是新闻学家、历史学家、诗人、书法家，是党和国家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而今成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因撰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被横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罪名。他因不能接受这些罪名，又无法正常申辩，便留下遗书，以死抗争，终年才54岁。按说，他的死是件很不寻常的事，应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和警惕。北京市委曾为此报告中央。事后，李雪峰曾传达中央和毛泽东的批示。想不到批示中毛泽东对此竟很不以为然。对此，惺惺相惜，引起我无可名状的悲凉。应该说，我参加革命，对于毛主席有出自内心的敬仰、热爱和崇拜，而他对邓拓之死有如此批示，真使我大感意外。由于毛泽东有这样的态度，作为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在一次会议上，在说到邓拓之死及其遗书时，也轻蔑地说：“邓拓的遗书很恶毒，睁眼说瞎话，用他的行动作出结论。遗书坚持反动立场，说过去的一切与彭（真）刘（仁）无关，实则是坚决的包庇。其次，对所有的批判都反对……”从李雪峰讲话所透露出的邓拓遗书的点滴内容看，邓拓确是宁折不弯的大丈夫。他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坚持实事求是，既不媚上，也不随俗，绝不昧心地揭发自己的领导和同事，也不违心承认莫须有的罪名，这是何等高尚刚毅的品节和情操！

到北京市委工作后，另一项活动就是参加原北京市委、市人委副部长以上的所谓“揭发批判彭真及三家村黑帮”的大会。这次会从5月22日起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的基调

是揭发批判北京市委原来主要领导彭真、刘仁、郑天翔等人的问题，要求与会者勇敢揭发，同时也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北京新市委的工作人员按李雪峰的指示，或专门参加此会，或只到会听报告、听发言，同时兼顾文化大革命和日常工作。我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只到会听听报告和与会者的发言，并在市委书记处会议上，分析研究北京市委原有干部的思想表现。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原北京市委的一些干部，如崔月犁、张大中、韩伯平、张文松、宋硕等都曾在会上无可奈何地作过或揭发或检查性的发言。有一次会议还专门安排了原北京市委的三位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作检查，以便过关。吴德曾在书记处会上说：“要争取老万（指万里）早些解放出来，参与工作比较好！”后来，万里同志在北京市原有领导干部中确实是比较早出来参加的干部。这次会议，从5月22日开始，直到7月初被迫结束，因被中央文革小组指责为“是给牛鬼蛇神设置的安乐窝、避风港”而不得不中断。

作为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在这段时间的工作过程中，花费时期精力最多，感到最为棘手的，还是派工作组的问题，在此问题上使我充分感受到政治斗争中的残酷性，复杂性。

派工作组的导火线缘于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在北大贴出的大字报。众所周知，聂元梓的大字报直接点名攻击了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及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和党委副书记彭佩云，并扬言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由于当时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政治局扩大会的有关情况尚未公布，在此之前党中央、国务院曾经发出过关于贴大字报的指示和规定，如“遵守纪律”、“内外有别”等，因此，聂元梓的大字报张贴之后，既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也遭到了许多北大师生的反击。同时，也在社会上特别是各高等学校引起强烈的反应。出人意料的是，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却全文广播了这张大字报，随之《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高度评价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因而很快在北京、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许多单位的领导机构即刻遭到炮轰而陷入瘫痪状态，在群众之间也形成了或支持、或反对单位党委领导的严重对立。由此形成了领导与群众之间、群众相互间的矛盾，甚至发生各种游斗、打人、群斗、体罚、自杀等不正常的事件。当时，周恩来、邓小平等

领导，为稳定社会正常秩序，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开展，作出了派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的决定。据我所知，在此之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就在5月30日向在外地的毛泽东请示，拟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毛泽东于当天就表示：“同意这样做”。当时大家都认为派工作组是顺理成章的事，包括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均未对此提出异议。

北大的工作组派出去之后，各方面的情况都紧张起来，各个学校都要求派工作组。一两天内北京市、华北局和中央工交系统就抽调了四十多名干部，包括中央组织部及其他各部的正、副部长，分别到各个大学任工作组组长，如一机部副部长孙友渔于6月4日到北师大，经委副主任叶林6月5日到清华。还有对各个部所属的高校，也由各个部派出干部到部属的学校。北京市的各个中小学由中央领导协调，由团中央负责派出工作组或联络组。

派工作组大都经过我与各方面磋商。时间急迫，要求又高，有时就算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立即派出，为此，陈伯达、康生等还曾反复催促“要快派”“尽快派”。截至6月13日，我到上海出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之前，各个高校工作组的状况是：一是已派出去的有38所；二是未派出的有14所（如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化学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三是要求马上派工作组的有北京第二医学院、人民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四是不需急派工作组的有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学院等。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工作，我原以为派出工作组，就可以舒一口气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更复杂、更尖锐的斗争都在后面。一方面是一些学校的工作组与所在学校的造反派发生矛盾和斗争；另一方面是中央高层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发生分歧。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北京新市委的李雪峰主张派；江青、陈伯达、康生则窥测毛泽东的意图，以求政治投机。他们开始也主张派，后来看风使舵又反对派，还横生枝节，制造矛盾。使斗争变得更为复杂。我则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斗争的漩涡，甚至成了替罪羊。

在北京市委工作期间，还有件需要一提的事情，1966年7月初，华北局要在北京市召开工作会议，集中讨论文革的问题。为此，市委要准备一个大会发言。我和黄志刚根据李

雪峰一次讲话精神，先草拟了一个提纲，再由市委简报组起草成文，经过书记处会议讨论，最后由李雪峰、吴德定稿，而后让我在会上代表北京新市委发言，还用市委名义，以《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汇报要点》上报中央。这个报告因贯彻了支持派工作组的思想内容，后来被指责为是“贯彻资产阶教反动路线的代表和典型”。我想，这大概是我被撤销北京市文教书记的根据，但执行“反动路线”的又何止是我呢？我为什么被撤职，始终没有任何人向我说明。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有病在家休养时，吴德同志曾到家看望，相互交流中我曾问他：“我到底为什么被撤职？”他满脸带笑却支支吾吾，没有说出所以然。

1965年5月中旬我到北京市委工作时，中央正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会议从5月4日举行至5月26日结束。由于会议进行过程中我才到市委工作，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会议的情况我很快就知道了。一则是李雪峰同志在市委的书记处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使我对会议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有了整体了解；再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万里同志参加了该会。而我与万里是相识相交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就同在冀鲁豫区工作，我1963年到北京在人民大学工作后，仍不断交往。现在又同在北京市委，他虽然是原北京市委的领导，却不是主要斗争对象，我们相互交谈较多。他自然向我谈到会议的情况。从李雪峰的传达和万里的交谈中，我了解到整个会议过程中毛主席在外地，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主题：一，传达通报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二：揭发批判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三，讨论通过由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因5月16日通过，即所谓《五一六通知》）。万里同志还向我透露了一些会议的细节。当时，我们两人有些同感，都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次会议不大正常，主要表现在：

第一，因为毛主席在外地未参加会议，由少奇主持会议，中央其它几位副主席都出席了会议，而且这几位副主席都排名在林彪之前。然而，围绕会议主题讲话的却是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会议开始前的两个半天，首先由康生向会议系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及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的有关指示；介绍和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的起草过程及毛泽东对《通知》的修改意见，以及毛泽东在此前后几次



谈话的内容，这就为会议定了基调。接着由张春桥在会上系统介绍了彭真、陆定一“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陈伯达在台上讲话，他提出对彭真要“新帐老帐一起算”，尤其是“要揭发他的历史问题”。林彪更是充分的表演，他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谈古今中外的所谓政变（即被称之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肆意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就是要“搞政变”、“搞颠覆”“要篡权”。与之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大搞个人崇拜。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一万句”之类的话，就是他在本次讲话中提出的。我们从这次会议的安排中感到作为此次会议主持者的刘少奇与其他几位副主席似乎都不能主导会议，整个会议实际仍由毛泽东在后面指挥，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在前台表演。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一民主集中制，显然不大正常。

第二，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彭真、陆定一等人问题的指示后，展开对他们的揭发和批判。批判的调门定得极高，罪名都大得吓人，都是按毛泽东那段有名的论断：“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我们的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又进一步直接演绎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的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其它与会者的调门不得不按这样的调门附和，却不允许被批判者自我申辩。

会议虽然安排了彭真、陆定一检查，但彭真在大会上仅仅讲了五六分钟，他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名活动，我连做梦都没想到。”康生随即摆出一副打手架势，强词夺理地反驳说：你这个讲话就是反对《五一六通知》，“这些人物，有些已经教我们识破了”，这段话就是毛主席特别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总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怎么回答呢？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

陆定一在检讨中说，他“主观上绝没有想变天”。林彪则马上反驳说：“你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强词夺理，血口喷人，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党内民主气氛。另外，会上

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彭真等四人进行专案审查。但与之同时会上又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及杨尚昆等人的职务。这几位参加革命几十年，在全国党、政、军中有很高地位、很高声望的老同志，就这样不容分辨轻率地被撤了职。按常理说，组织处理应根据审查的结果，怎么能在专案审查尚未进行时，就作出撤职的组织处理呢？我感到这些都是违背党章、不按组织原则办事、践踏党内民主的很不正常的做法。

第三，更为不正常的是林彪在会上抓住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曾写匿名信的问题，揪住陆定一大吵、大闹。陆定一曾就严慰冰写匿名信问题在会上检查说：“我不知道，她既没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林彪则反问，“你老婆的事，你怎么能不知道？”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听后更加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指着陆定一的鼻子叫嚷：老子我恨不得枪毙了你！”另外，更令人厌恶的是在陆定一做检查的那天会场上，每位与会者的桌面上还放了一份由林彪签名的复印件，上面写了：叶群和我结婚时是处女，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之类的内容。我感到这些都实在不像话。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上，一个身为党的副主席的人，对于另一位党的高层领导，为了个人恩怨竟然如此歇斯底里大发作，这在以往的党内生活中，还从来没有见过。严慰冰写匿名信固然不妥，但其写的内容毕竟是属于个人恩怨与猜忌，属于家中琐事，不涉及政治内容，怎么能搬到党的政治局扩大会上大吵大闹呢？这实在是丢人，完全败坏党的形象。难怪出席会议的聂荣臻元帅看到桌子上摆的林彪的手书后，就举着它，十分生气地冲着主席台喊：“发这个干啥？收回！”这使我感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很不对头。我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出现这样的闹剧是怎么形成的？这与所谓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又有什么关系？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彭、罗、陆、杨是否搞政变、搞复辟，应有确凿的真凭实据，不能因为他们不同意毛、林的某些意见和说法，就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肯定他们搞政变、谋复辟。难道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那么多高层党政领导，真的相信这些说法吗？为什么能一致举手通过呢？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在场也不会表示异议，党内生活与党内斗争发展到这种程度怎能不令人忧虑和深思呢？■

## 【读者来信】

## 张新民谈“九一三”专辑

我查了2014至2017年的《记忆》，发现“九一三”研究，在近两年中固定成了纪念性的专辑。而在这以前，似乎还没有这种意识。2013-10-31《记忆》103期，只有一篇天穹的文章《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2014年9月30日《记忆》119期，就从一篇文章发展成了一个专栏——【九一三研究】，专栏里有三尺晴天、蒋健等人的五篇文章。

内容丰富了，见解也深入了。三尺晴天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蒋健的文章还是那样缜密严谨。遗憾的是，到了2015年完全把“九一三”忘了。这一年从九月到十月，一个字的“九一三”也没有。我当时想，是啊，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这年头谁还想着林副主席呀。

没想到，2016年的9月13日，《记忆》有了纪念意识，连着推出两期“九一三专辑”——167期向红的《“身逐塞鸿来万里，手披荒草看孤坟”——探访“九一三”坠机现场》让人魂牵神绕，越人的《林彪与七千人大会——兼论七千人大会前后的高层政治互动与博弈》，丁凯文的《浅谈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也都是重头文章。蒋健也卷土重来，以《再谈林彪专机的“黑匣子”》和《“林彪强行与叶群发生性关系”考——兼谈历史要靠“性”来生动吗？》两篇考证文章，力克群雄。168期“中央学习班·周向红专案”，虽然内容枯燥，但前面的《我的文革》，我读了两三遍，最后一段让我泪眼模糊——

今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是“9·13”事件第四十五周年，三月的一天早上，我鼓足勇气打开尘封已久的档案，如烟的往事历历在目，看到了在政治漩涡里一个无辜、上进、好学的孩子从“革命战士”到“复退军人”再到“现行反革命”一路上的苦苦挣扎，如实地反映了阶级斗争观念下整个社会不仅人性丧失、狂热偏执、文化断裂，而且在无限上纲和滥用专政手段的“红色恐怖”下，导致了人人为了自保的“自黑”与互害。

翻阅中我蓦然发现了其中夹了那张当年我填写的、被空军从北京市海淀区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擅自拿走的待分配卡片，它就静静地夹在发黄的卷宗里，无声地控诉着被剥

夺的自由、被剥夺的时光、被剥夺的权利、被扭曲的人性……。我无言地盯住它，明白自己的人生本来可以是另一番风景，顿时感到痛彻心扉！就是这张卡片，促使我下了原文公布自己专案的决心，用以纪念这两个不应当忘记的日子，用以告诫人们这两个日子应当永不再来，是曰“我的‘文革’”。

记得那天晚上，我姐姐正好从加国来电话，我在电话把这段念给她听。像周向红一样，她也曾经是“一个无辜、上进、好学的女孩子”，也从“革命战士”变成了“现行反革命”。不同的是，她是政治风波中成了现反，她“苦苦挣扎”从香港到欧州，最后落脚加国。

我又把这一期转发给了十几位大学同学。同学们也都对周向红多有同情和敬意。不说别的，就是敢把自己的那些交待、通信、日记拿出来，就是勇者，就是对历史对社会对后代负责任的人。一个同学来信说，周向红是非常之人。是啊，能从苦难里挣扎出来，不气馁，不灰心，不逍遥遁世，难能可贵啊！

169期读者来信，沈阳的“花开花落”的来信最合我意——

向红“专案”的问世是一奇迹。因“九一三”被办学习班者无数，能保留其档案且敢于令其素面见人者，唯向红一人而已。孟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可以用在向红身上。特撰四句四言赠向红女士——

大哉向红，至仁至勇；以此裙钗，傲彼群雄。

大哉向红，真性真情；祭彼先君，永光其荣。

大哉向红，何罪何辜？蒙冤半世，笑看荣枯。

大哉向红，可默可鸣；伏彼草野，问此苍穹。

今年的“九一三”，《记忆》竟推出了四期！都是空四军原副参谋长杨忠立在“九一三”后写的检查。【黑会】【黑线】【黑言论】……从这些栏目名称上，就可以体会老革命杨忠立的心情。这又是一个勇敢者，敢于把自己老爸的检查公之于众。这需要大勇气。官家希望文革亲历者都死光光，希望毛时代的人把过去忘光光，希望大家认准吃喝玩乐，挣钱发财。周向红、杨辉平站出来，大声地说，NO！他们的勇敢，他们的担当，让这个梦碎。■

## 【本刊声明】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 行